

論張王樂府與唐代新樂府形成之關係*

呂家慧**

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摘 要

李白和杜甫是盛唐創作樂府最多的詩人，李白專力於古題，杜甫則多作新題，到元稹、白居易形成新樂府。李、杜以後，元、白之前，張籍、王建新舊題樂府並作，是當時創作樂府數量最多的一對詩人，一方面延續李白擬古樂府的創作，將初唐律化的古樂府恢復為古體，並進一步深化樂府「傷民病」的傳統，遂有別於李白以樂府言志的路數；另一方面又接受杜甫的理念，將時事、歌行及取法漢魏的樂府題結合，並拓展其他歌辭性新題的時事針對性，將新舊題樂府都帶入關懷時事之途，更直接地上接漢魏樂府的傳統。張、王樂府唱和的過程中，新題樂府亦隨之生成。其創作模式影響李紳、白居易和元稹的樂府創作。而張、王從唱和中取材，也對元、白的樂府創作產生相當的影響。

關鍵詞：李白，杜甫，張籍，王建，新樂府

* 本文曾獲學報主編、兩位匿名評審人及香港中文大學張健教授的修改意見，對本文霑溉良多，特此致謝。

** 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講師，電子郵件信箱：chlu@hksyu.edu

一、前言

樂府詩是唐詩傳統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關於唐代樂府詩的歷史演變過程，此前學界普遍的論述是：從古題樂府到新樂府的發展史。李白 (701-762) 大力擬作漢魏古樂府，代表了唐代樂府對於古樂府傳統的繼承關係以及古題樂府創作的最高成就；杜甫 (712-770) 則集中創作新題以關懷時事，直接啟發了中唐元稹 (779-831)、白居易 (772-846) 等人新樂府¹ 的創作，是唐樂府從繼承古樂府傳統到創立新樂府傳統的先驅。但是，在李、杜之後，元、白之前，張籍 (約 766-830)、王建 (約 766-834) 是兩位集中創作樂府而且具有相當影響的詩人。那麼，張王樂府在唐樂府演變史上究竟有什麼樣的作用及地位？此一問題學術界尚未有明確的論述及回答。

廖美雲《元白新樂府研究》及鍾優民《新樂府詩派研究》對新樂府的醞釀、成立及影響均有論述，² 但其側重點在於個別作家的分析而較少涉及詩人對詩人的繼承與發展。葛曉音〈論李白樂府的復與變〉、〈論杜甫的新題樂府〉以及〈新樂府的緣起和界定〉三篇文章指出李、杜的樂府創作對於唐代樂府發展的意義，並從樂府及歌行的發展趨勢還原中唐新樂府的緣起及發展脈絡，³ 但從李、杜到元白新樂府正式成立以前，張、王乃集中創作樂府者，他們對於新樂府的作用與貢獻為何？葛先生尚未有正面論述。此外，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注意到杜甫對於張王新題樂府的影響，⁴ 但此一影響如何落實到實際的作品上，與當時新題歌行的發展關係如何，也尚有可以展開的空間。

本文擬將張王樂府放回到唐代樂府從舊題到新樂府演變的歷史脈絡中，分三個方面加以考察：一、張王樂府對於李白擬古樂府的繼承與發展；二、張王樂府對杜

¹ 所謂「新樂府」即是指盛、中唐之際，一批詩人包括杜甫、元結、韋應物、張籍、王建等，追步漢魏樂府的命題及表現方式，創作出一批新題樂府或歌行，其中包含為數可觀的「興諷刺時」的作品。元和四年 (809)，李紳、元稹和白居易承繼此一趨勢，其理念直承《詩經》，而實際創作卻借鑑盛、中唐以來新題樂府或歌行的創作模式，並深化其針砭時事的內容，正式提出「新樂府」的名稱。葛曉音，《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新樂府的源起和界定〉，頁 178-196。

² 廖美雲，《元白新樂府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鍾優民，《新樂府詩派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

³ 葛曉音，《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頁 162-210。

⁴ 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2002），第 2 章，頁 148-149。

甫以新題歌行關懷時事的認識與發揚；三、張王樂府對元白新樂府的啟發與影響。希望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探討，能夠更細緻的梳理新樂府在正式成立以前樂府體的漸變與發展，以見張王樂府的作用與貢獻。

二、張王擬古樂府對於現實關懷的深化

李白是盛唐樂府創作最豐者，他大量擬作漢魏古題，以古樂府實踐其「將復古道」的理想。⁵ 李白之後古樂府的創作不盛，要到中唐張籍、王建才有較為集中的創作。從今存的作品觀之，張籍八十九首作品中，有三十五首屬古題樂府；王建七十九首樂府中也有二十三首屬古題或是從古題引申而出。若將張、王所擬的古題樂府按照郭茂倩《樂府詩集》的標準加以分類，他們古題擬作的情況如表一：

表一：張王擬古樂府與《樂府詩集》分類對照表⁶

	張籍	王建
相和歌辭	8 首	6 首
雜曲歌辭	11 首	3 首
雜歌謠辭	2 首	1 首
橫吹曲辭	4 首	2 首
鼓吹曲辭	3 首	1 首
清商曲辭	3 首	2 首
琴曲歌辭	3 首	3 首
舞曲歌辭	1 首	2 首

⁵ 「據郭茂倩《樂府詩集》所錄，初盛唐詩人創作的全部樂府詩（郊廟歌辭和燕射歌辭不計在內）計四百五十首左右，李白作一四九首，占三分之一。除去近代曲辭和新樂府辭，初盛唐所作漢魏六朝古題樂府計四百首左右，李白作一二二首，占百分之三十。而在李白的全部樂府中，漢魏古題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其餘百分之二十中，除了寫於供奉宮廷期間的十一首近代曲辭以外，尚有十七首新樂府辭，也都近似古樂府。」葛曉音，《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論李白樂府的復與變〉，頁 162。

⁶ 本表是根據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及尹占華校著《王建詩集校注》所著錄的張王樂府，對照郭茂倩《樂府詩集》的分類整理而成。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王建著，尹占華校著，《王建詩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6）；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據表一，張、王對樂府古題的擬作集中在相和歌辭和雜曲歌辭，這兩種古題主要來自漢魏晉，再加上橫吹、鼓吹曲辭，共計三十七首，占全部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以漢魏古題所占的比重最大。

從樂府的體式來看，許多漢魏古題受到南北朝詩歌律化的影響，在初盛唐文人手上都是律詩，⁷ 盧照鄰、沈佺期〈上之回〉、楊炯、盧照鄰〈戰城南〉、盧照鄰、崔融、沈佺期、儲光義〈關山月〉、楊炯、蘇頌、駱賓王、喬備、沈佺期、王維、王昌齡〈出塞〉、楊炯、駱賓王、王昌齡〈從軍行〉、徐洪〈採蓮曲〉、李百藥、杜審言〈妾薄命〉等古題都是合乎格律的律詩。這些古題到了李白手中又變成五、七言古詩或雜言歌行，是李白用樂府回應他對於「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⁸ 的看法。但李白之後，律化的古題樂府仍有人創作，大曆詩人皇甫冉、李端的〈巫山高〉、耿漳、于鵠的〈出塞〉、皎然的〈從軍行〉及劉長卿、戴叔倫的〈長門怨〉都是整齊的律詩，盧綸的〈從軍行〉甚至是五言的排律。排比張籍、王建的古題擬作，其絕大多數的古樂府都是七言古詩或雜言歌行，說明張、王在體式上的復古是與李白的創作實踐一致的。以唐人擬作較多的〈關山月〉為例，此題在沈佺期手上變成五言律詩，李白則以五古擬作，但其後的大曆詩人耿漳、戴叔倫、李端、李益和司空曙仍均以五律出之，直到張籍、王建的擬作，此題目方又變成三、七雜言歌行。且又就內容來說，大曆詩人的〈關山月〉大抵不脫邊關風景的描繪及思婦征人的情懷，張籍「可憐萬國關山道，年年戰骨多秋草」⁹ 和王建「凍輪當磧光悠悠，照見三堆兩堆骨」，¹⁰ 表達的是對於陣亡將士的同情，可以說是對李白「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¹¹ 的深化。類似的例子還有〈從軍行〉、〈遠別離〉和〈採蓮曲〉等。有些古題在盛唐只有李白一人擬作，如〈獨漉篇〉、〈空城雀〉和〈估客樂〉等，這些題目在張籍、王建手上得到發展。〈獨漉篇〉原辭為晉〈獨漉歌〉，語言頗類漢時童謠「獨漉獨漉，水深泥濁。泥濁尚可，

⁷ 王運熙、王國安先生指出《樂府詩集》共收初唐四傑的樂府詩二十六首（王勃六題七首，盧照鄰十四首，駱賓王四題五首，楊炯未收），其中協律或基本協律的五言近體達十五首之多。《樂府詩集》又收盛唐王維樂府詩十四題二十二首，形式多採七言歌行或七絕，王昌齡七題二十二首，其中七絕共佔十一首，其他詩人如高適、王之渙或岑參等，或以律、絕作樂府詩，或在歌行中融進許多律句，講究對偶，都可見律詩對於樂府詩的滲透。王運熙、王國安，《樂府詩集導讀》（成都：巴蜀書社，1999），〈文人樂府詩的全盛：樂府詩集中的唐代樂府詩〉，頁 101-120。

⁸ 孟榮，《本事詩》（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高逸第三〉，頁 16。

⁹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上冊，卷 1，〈關山月〉，頁 80-81。

¹⁰ 王建著，尹占華校著，《王建詩集校注》，卷 2，〈關山月〉，頁 44。

¹¹ 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4，〈關山月〉，頁 219。

水深殺我」，¹² 李白則根據古辭引出「越鳥從南來，胡雁亦北度」¹³ 的比興，又從射雁的設想轉出雄劍掛壁、國恥未雪的感慨來。王建〈獨漉曲〉則更進一步往漢謠靠近：「獨漉獨漉，鼠食貓肉。烏日中，鶴露宿，黃河水直人心曲。」¹⁴ 詩句用四種反常的現象表達世道黑暗、是非顛倒之意。張、王擬作唐人罕作的古題本身便是一種復古的立場，而就表現手法來看，無論是〈獨漉歌〉的漢謠風格，〈空城雀〉採漢樂府常見的對話模式，〈賈客樂〉發揮題面意旨等，都可見張、王對於漢魏樂府之借鑑，他們對於漢魏樂府傳統的發揚是很明顯的。另外，有些題目雖然李白沒有同題擬作，但在張籍或王建的手上也恢復了古體，如〈江南曲〉在大曆詩人如韓翃、李益和于鵠的擬作中律化，張籍〈江南曲〉卻以七古出之，且不同於前人只是以兩聯的篇幅側寫江南的一面，張籍更全面地描繪「江南風土歡樂多」，連「土地卑濕饒蟲蛇」的素材也能入題，可說寫出此題的新意。又比如〈董逃行〉在唐代只有張籍、元稹擬作，崔豹《古今注》曰：「〈董逃歌〉，後漢游童所作也。終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為歌章，樂府奏之以為儆誡焉」，¹⁵ 今存古辭但言求仙以擁護君上之壽考，晉傅玄擬作具述夫婦離別之思，陸機則「但言節物芳華，可即時行樂，無使徂齡坐徙而已。」¹⁶ 張籍「董逃行，漢家幾時重太平」¹⁷ 恢復古題古意以敘寫唐朝時事。〈白鼉吟〉在唐代僅有張籍一人擬作，原辭來自〈吳孫亮初白鼉鳴童謠〉：「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¹⁸ 根據《宋書·五行志》的解釋：「吳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按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象也。」¹⁹ 張籍則擬為「天欲雨，有東風，南溪白鼉鳴窟中。六月人家井無水，夜聞鼉聲人盡起。」²⁰ 延續童謠的語言風格，卻改孫吳兵讖之兆，恢復鼉鳴叫，為雨兆的風俗意義，²¹ 更加貼近庶民生

¹² 郭茂倩，《樂府詩集》第3冊，卷54，頁790。

¹³ 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上冊，卷4，〈獨漉篇〉，頁221。

¹⁴ 王建著，尹占華校注，《王建詩集校注》，卷2，〈獨漉曲〉，頁58。

¹⁵ 郭茂倩，《樂府詩集》第2冊，卷34，頁504-505。

¹⁶ 同前引，頁505。

¹⁷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下冊，卷7，〈董逃行〉，頁813。

¹⁸ 郭茂倩，《樂府詩集》第4冊，卷88，頁1241。

¹⁹ 同前引。

²⁰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下冊，卷7，〈白鼉吟〉，頁819。

²¹ 陸佃《俚雅》：「狔將風則踴，鼉欲雨則鳴，故里俗以狔讖風，以鼉讖雨。」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庫》第47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清刊本），卷2，〈釋魚·鼉〉，頁359上。

活。以上可知在初唐律化的古樂府雖然大部分在李白手中恢復古體，但一直到大曆時期，這些古題仍有以律詩表現者，而張、王絕大部分的古題樂府都是七言或雜言古詩，這就說明他們對樂府的復古立場。其次，他們的古題樂府或恢復古題古意，或在表現方式上模擬漢魏樂府童謠慣常的藝術手法，這也說明張王樂府對漢魏樂府的認識及追步痕跡。

擬漢魏古樂府的風潮始自初盛唐，²² 而初盛唐詩人又以李白所作古題樂府為最多，漢魏樂府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比較張、王和李白的同題古樂府，可以發現兩者在主題內容上的差異。李白的古樂府多用以述懷言志，這是因為在李白的時代，復古的概念和制禮作樂是分不開的，〈古風〉其一「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²³ 體現的是盛唐文人希望風雲際會，復興上古淳樸政治的理想。〈留別金陵諸公〉「至今秦淮間，禮樂秀群英。地扇鄒魯學，詩騰顏謝名」、²⁴ 〈贈從孫義興宰銘〉「絃歌欣再理，和樂醉人心」²⁵ 也都說明他要以禮樂化俗的思想。李白「願一佐明主，功成還舊林」，²⁶ 肯定他所遭遇的是一個「明主」，那麼他的問題更在於是否能得到「王佐」的機會，而不是批判「明主」的朝政失當。是故李白的古樂府更偏重個人之興寄，時事針對性則相對薄弱。這種觀念到了天寶中後期開始轉變，元結寫下「父子忍猜害，君臣敢欺詐」，²⁷ 甚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²⁸ 的杜甫，在亂後也寫下「雖乏諍諫姿，恐君有遺失」、「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²⁹ 質疑天子也會犯錯、猜忌，也有不賢明的可能，這和指望明主制禮作樂以復周道的理想是多麼的不同。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讀君學仙詩，可諷放佚君」，³⁰ 看中的正是張籍樂府有「刺上」的內

²² 「初盛唐詩人所作古題樂府中，各類曲辭所占比例：鼓吹曲辭十種，共二十三首。橫吹曲辭十九種，五十二首。相和歌詞四十六種，一百四十首。清商曲辭二十四種，五十首。舞曲歌辭兩種，七首。琴曲歌辭十四種，十七首。雜曲歌詞六十種，二零五首。……漢魏樂府古題的比重最大，計一百三十五種，三百二十首。」葛曉音，《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盛唐清樂的衰落和古樂府的興盛〉，頁 153-154。

²³ 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上冊，卷 2，〈古風〉五十九首其一，頁 87。

²⁴ 同前引，中冊，卷 15，〈留別金陵諸公〉，頁 726。

²⁵ 同前引，上冊，卷 10，〈贈從孫義興宰銘〉，頁 533。

²⁶ 同前引，中冊，卷 15，〈留別王司馬嵩〉，頁 712。

²⁷ 元結著，聶文郁注解，《元結詩解》（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系樂府·隴上嘆〉，頁 125。

²⁸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 1，〈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頁 74。

²⁹ 同前引，卷 5，〈北征〉，頁 395；第 5 冊，卷 22，〈奉贈盧五丈參謀琚〉，頁 2003。

³⁰ 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 1，〈讀張籍

涵，也正因為盛、中唐這種儒家教化觀念的轉向，致使相對於李白，張籍、王建的擬作以關懷現實、抨擊時政為最突出的內容。

古題〈猛虎行〉是相和歌辭，郭茂倩題解云：「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³¹《樂府解題》則曰：「言從遠役，猶耿介，不以艱險改節也。」³² 陸機、謝靈運到唐代的儲光羲都還維持志士固節的古辭意旨。李白「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以猛虎比喻外族之征伐，其中「旌旗續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顛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一輪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亦涉及現實戰況的描寫，但這首詩主要還是在抒發李白自己懷才不遇、有志難伸的感嘆，是「賢哲栖栖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³³ 到了張、王筆下，猛虎依然是樂府的主角，但張籍則一變古題內涵，從「猛虎」兩字發揮，虛構猛虎對於村家的危害，以及五陵少年對於民害所表現出的怯懦，「五陵年少不敢射，空來林下看行跡。」³⁴ 這實際上是一種社會現象的寓言，猛虎或暗指唐代為禍愈劇的藩鎮。「以賦為比」本就是漢魏樂府慣常的表現手法，張籍一方面對於樂府傳統有所繼承，另一方面抨擊五陵年少所代表的權貴，則已具備新樂府之精神。王建又從古題引申出新題〈射虎行〉：「遠立不敢污箭鏃，聞死還來分虎肉。惜留猛虎著深山，射殺恐畏終身閒。」³⁵ 亦可視為一首政治諷諭詩，對諸將「畏禍貪功」，養寇自重的現實提出批判。鍾惺《唐詩歸》評王建〈射虎行〉云：「有激之言，字字痛切，似為千古朝事、邊事寫一招狀」，³⁶《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引吳山民語云：「人情精透」。³⁷ 這些評語都點出張王樂府的一個側面，即在樂府的具體敘事中表現出一種超越具體時事的帶有普遍性的人情，凸顯「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禮記·樂記》）的感受，從而引起讀者的同情共感。唐代「養寇自重」的現象不因時代變遷而變得無法理解，這是因為張王樂府所針對的不僅只是一個具體的政治事件，而更

古樂府》，頁 8。

³¹ 郭茂倩，《樂府詩集》第 2 冊，卷 31，頁 462。

³² 同前引，頁 462-463。

³³ 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上冊，卷 6，〈猛虎行〉，頁 360-366。

³⁴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上冊，卷 1，〈猛虎行〉，頁 34。

³⁵ 王建著，尹占華校注，《王建詩集校注》，卷 2，〈射虎行〉，頁 78。

³⁶ 鍾惺、譚元春輯，《唐詩歸》，《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59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27，頁 161 上。

³⁷ 周珽輯，《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26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卷 20，頁 95 下。

從事件提煉出背後所隱含的人性矛盾，這種矛盾又是古今所共有的。站在普遍的人情角度抒發情感正是漢魏樂府的典型特徵。另一方面來說，〈猛虎行〉一類作品針對中唐藩鎮割據的政治現實，又不同於漢魏樂府往往只是截取生活的單一場面，在「倫理」的層面上抒發人世之感受，儘管張籍、王建從未提出新樂府之名，但在他們對於樂府創作的摸索中，實已寫出符合新樂府邏輯的作品。

有趣的是在張、王〈猛虎行〉和〈射虎行〉以前，大曆詩人獨孤及〈和李尚書畫射虎圖歌〉云：

飢虎呀呀立當路，萬夫震恐百獸怒。……居然畫中見真態，若務除惡不顧私。時和年豐五兵已，白額未誅壯士恥。分銖遠邇懸穀中，不中不發思全功。……³⁸

雖然是一首詠畫的歌詩，但歌頌壯士除惡務盡的義行，卻和張、王筆下的官差和五陵少年形成對比，就像是張、王主題的正面立說，古題〈猛虎行〉的中心意旨是志士必須固守節操，儲光義筆下的猛虎一變為敘寫對象，然尚維持有所不為的形象，至張、王作品，猛虎又變為殘害人民的禍難，在主題上卻與獨孤及的〈射虎圖歌〉合流，只是後者是從正面歌頌射虎者，張、王卻譴責那些理應「思發全功」卻不敢或不願這麼做的人。從這個角度來說，張王樂府對於大曆詩人的歌詩還是有所吸收和繼承。

除了漢魏古題外，產生於六朝的樂府古題也開始為現實服務。相和歌辭〈估客樂〉是南朝齊所出，《古今樂錄》解釋：「《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製也。帝布衣時，嘗遊樊、鄧。登祚以後，追憶往事而作歌」，³⁹ 在張籍以前，此題多與賈客的內容無關，如李白「海客乘天風，將船遠行役。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跡」，⁴⁰ 即發揮賈客遠遊的一端意思，以古詩常用的「雲中鳥」意象來寫別離。

張籍的〈賈客樂〉⁴¹ 則扣住「賈客」主題，詳細描寫商賈的水上生活，最後從「姓名不在縣籍中」轉出姓名猶在縣籍中，必須負擔沉重稅務的農民，從賈客樂襯托農民苦，抨擊唐代賦稅制度的不合理。張籍以「賈客」為「賈客樂」的內容，

³⁸ 獨孤及，〈和李尚書畫射虎圖歌〉，收入彭定求等奉敕編，《全唐詩》第 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 247，頁 2770。

³⁹ 郭茂倩，《樂府詩集》第 3 冊，卷 48，頁 699。

⁴⁰ 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上冊，卷 6，〈估客行〉，頁 354。

⁴¹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上冊，卷 1，〈賈客樂〉，頁 95-96。

從古題寫出新意，凸顯現實的不公，與李白的古題樂府有所區隔。元稹〈估客樂〉：「估客無住著，有利身即行」，對於商賈勢利的嘴臉有深刻的刻畫，其中「小兒販鹽鹵，不入州縣征」，⁴² 可以說是前承張籍的意旨。

〈遠別離〉在《樂府詩集》列入「雜曲歌辭」，是古題〈古別離〉之延伸。李白取皇英二女淚染湘竹的故事以及《竹書》雜記舜幽囚、禹野死的傳說加以發揮，深自寄託「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⁴³ 的諷刺；張籍也有〈遠別離〉一首：「蓮葉團團杏花拆，長江鯉魚鬚鬣赤。念君少年棄親戚，千里萬里獨為客。誰言遠別心不易，天星墜地能為石。幾時斷得城南陌，勿使居人有行役。」⁴⁴ 儘管李白的〈遠別離〉也可被視為一首政治諷諭詩，但李白是以豐富的想像力佐以誇張的詞采寫成，是以胡震亨評此詩：「使其詞閃幻可駭，增奇險之趣，蓋體幹於楚騷，而韻調於漢饒歌諸曲，以成為一家語。」⁴⁵ 張籍則站在思婦的角度，因為擔心遠行的丈夫會有二心，竟然希望城南陌能夠斷絕。比起李白帶入上古傳說，發揮縱橫的想像力，張詩無論是「蓮葉、長江」的起興或是「天星墜地能為石」的比喻，都更符合民歌的聲口，且結尾將「少年棄親戚」的根源歸咎於「行役」，亦是針對當代賦役制度的抨擊。

〈妾薄命〉屬雜曲歌辭，在唐代有較多擬作，今尚可見崔國輔、武平一、李百藥等人的作品，其旨則不脫豔情閨怨之私。到了李白則以漢武阿嬌的故事為喻，佐以〈白頭吟〉古辭「躑躅禦溝止，溝水東西流」的句式，寫下「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最後總結「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⁴⁶ 的人生感嘆。而同樣的題目在張籍樂府則發展出另外的主題，張籍〈妾薄命〉云：「薄命嫁得良家子，無事從軍去萬里。漢家天子平四夷，護羌督尉裹屍歸。……」⁴⁷ 唐代的兵役主要是由六郡良家子所負擔，士卒將領要以死亡為代價，換得天子平定四方的榮耀，這本身就具有一種反戰的思想，把女子的薄命與時代的不幸勾連，和李白所詮釋的〈妾薄命〉是不同的路數。

李白更多的是發揮樂府或古詩抒懷寫憤的內涵，恢復的是漢魏樂府的興寄傳統。而張籍或王建的古題擬作，無論是沿用漢魏傳下的古題，或是時代稍後的六朝

⁴² 元稹著，周相錄校注，《元稹集校注》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卷 23，〈估客樂〉，頁 700。

⁴³ 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上冊，卷 3，〈遠別離〉，頁 157。

⁴⁴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上冊，卷 1，〈遠別離〉，頁 108。

⁴⁵ 高步瀛選注，《唐宋詩舉要》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 2，頁 155。

⁴⁶ 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上冊，卷 4，〈妾薄命〉，頁 267。

⁴⁷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上冊，卷 1，〈妾薄命〉，頁 105。

舊題，或是由舊題引申而出的類題，看到的都是漢魏樂府「美刺」之「刺」的一面，而且超越漢樂府「教化」對象在於下民而非朝政的原則，將抨擊對象上推到政府的種種舉措。從這個角度來說，張、王的古題樂府在精神上已導新樂府之前聲。李白綜合漢魏六朝以來的藝術表現形式，多數作品都是藉古題寓寄自我之感懷。張、王其他古題樂府如〈築城詞〉、〈別離曲〉、〈關山月〉、〈少年行〉、〈妾薄命〉、〈隴頭行〉、〈董逃行〉、〈羽林行〉等，則都是針對社會現實的不合理所發，詩人自我的形象不甚明顯。中唐前期的樂府創作本就不多，較可觀者如戎昱〈苦哉行〉五首，其中「夫婿與兄弟，目前見傷死。吞聲不許哭，還遣衣羅綺」⁴⁸被吸收到張籍的新題樂府歌行〈永嘉行〉「婦人出門隨亂兵，夫死眼前不敢哭」，只是張籍「九州諸侯自顧主，無人領兵來護主」，⁴⁹為女子的苦難提出時代的解釋，將時代的不幸指向朝政的失當，可謂古題新意。張、王延續李白發展了古題樂府一系的創作，並在創作中強化漢魏樂府關懷現實，體恤民生的一面，體現漢魏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原則。同時，張、王對於杜甫以新題歌行或樂府關懷實事的創作也有繼承，使唐代新、古樂府在元和新樂府正式成立前，都走向反映民生、抨擊時政的道路。張、王對於杜甫新題歌行或樂府的繼承發揚是下節所要探討的問題。

三、張王新題樂府與盛、中唐之際的樂府創作

白居易〈與元九書〉從興諷的角度評價李、杜云：「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又曰：「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⁵⁰白居易從興諷喻時的角度肯定時代較近的杜、韋，並承認二人對於新樂府的啟發作用。杜甫新題歌行對於新樂府創作的先導作用已有前輩學者詳論，⁵¹他的新題樂

⁴⁸ 戎昱著，臧維熙注，《戎昱詩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苦哉行〉，頁5。

⁴⁹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上冊，卷1，〈永嘉行〉，頁64。

⁵⁰ 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8，〈與元九書〉，頁323、327。

⁵¹ 「白居易標舉《詩經》創作新樂府，而將源頭上溯至杜甫、韋應物，客觀上是把新樂府緣起的兩條線：具有明確標榜《詩經》意識的蕭、元、顧的仿《詩經》、仿樂府體，和杜、韋等代表的以

府借鑑漢魏樂府多以三字題或「行」詩為主的主要形式，將反映時事的職能賦予這兩類題目，「這就比同時代的詩人更加自覺地將新題歌行與恢復漢魏古樂府的傳統聯繫起來了」，⁵² 可視為一種新趨向的產生。此外，韋應物部分新題歌行亦已具備時事針對性，是白居易所謂「頗近興諷」，⁵³ 這些作品或帶歌辭性題目「行」，或根據內容取三個字為題，可見他對漢魏樂府命題方式的吸收。韋應物「歌」、「行」俱作，雖然「行」詩不是每一首都針對現實，但關注現實的詩都在「行」詩，「歌」詩除了〈夏冰歌〉的尾巴外，都跟現實無關，絕大部分是詠物之作。白居易以杜、韋為新樂府的前驅，應是看到兩人以新題歌行的形式上接漢魏樂府傳統的共同實踐。⁵⁴

杜甫或韋應物對於新樂府的啟發在於以新題歌行關懷時事，唐王朝衰弱的現實刺激詩歌內容的轉向，並體現在各種詩體當中，⁵⁵ 但這類具有現實關懷的作品，其旨還是在於詩人自勉、或勉人為「良二千石」，因而大多是在送任的主題下順帶反映民生，時事諷諭的深度往往不足，也不是大曆詩人的創作主流。以名列高仲武《中興間氣集》第一位的詩人錢起為例，高仲武對他的評價是「員外詩，體格新奇，理致清贍……右丞沒後，員外為雄」，⁵⁶ 認為錢起的代表作是承接王維一系的山水詩，這同時也是《中興間氣集》的選詩標準以及整個大曆詩壇的創作主流。對於杜甫、韋應物同時或稍後的大部分詩人來說，現實的關懷並非寫作重點，此與白居易〈與元九書〉對六朝以降的判斷，「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

『行』詩為主的新題歌行擰到了一起。」葛曉音，《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新樂府的緣起和界定〉，頁 192。

⁵² 同前引，〈論杜甫的新題樂府〉，頁 202。

⁵³ 見〈驪山行〉、〈擊鼓行〉、〈采玉行〉、〈貴遊行〉、〈鳶奪巢〉諸作。

⁵⁴ 根據葛曉音先生的研究，杜甫歌行俱作，共計九十四首，其中歌四十三首，行五十一首，「『歌』類沒有刺時之作，反映時事的作品都在『行』類。……相比較之下，杜甫的『歌』和『行』，雖然有一部分在題材方面沒有明確分工，但『行』詩中反映時事和述志言懷的主題顯然遠多於『歌』詩。這種差別在盛唐詩中並不存在，從杜甫開始，到中唐前期，才逐漸形成歌與行在表現職能上的界線。」葛曉音，《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論杜甫的新題樂府〉，頁 199。又杜甫三十一首反映時事的新題歌行中，包括十六首帶有「行」類歌辭性題目，十五首即事名篇的二字或三字題，根據郭茂倩《樂府詩集》，「行」詩和取自篇首或概括全篇的二字三字題正是漢魏晉古樂府的主體，而漢魏樂府也正是以較為強烈的現實針對性為特徵，從命題的方式可見杜甫是有意識地以新題歌行學步漢魏樂府。韋應物除了〈夏冰歌〉的結尾外，反映時事的内容都在「行」詩，「歌」詩則以詠物為最大宗，如〈石鼓歌〉諸作，從韋詩「歌」、「行」的數量及其主體內容觀之，他的創作延續了杜甫「歌」、「行」的職能分工。

⁵⁵ 比如錢起和袁高的五古〈觀村人牧山田〉、〈茶山詩〉，或是戴叔倫的五律〈送謝夷甫宰餘姚縣〉等。

⁵⁶ 傅璇琮編撰，《唐人選唐詩新編》（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頁 463。

義盡去矣」也是相合的。

再從唐代新題歌行⁵⁷的發展來看，杜甫、韋應物因其新題歌行多涉時政之諷興，故為李紳、白居易等人所取法推崇。其實在杜甫前後，還有不少詩人創作新題歌行，若將這些歌行作一番排比分析，可進一步理解元白新樂府以前的樂府發展趨勢。以較為典型的「歌」詩和「行」詩為例，初、盛唐「行」詩多為古題，即便產生少數新題，亦是從古題衍生而出，而內容頗類古題，如劉希夷〈春女行〉、〈公子行〉或是袁瓘〈鴻門行〉等。另一方面，從數量上來說，杜、韋之後，張、王之前的「歌」詩遠多於「行」詩，內容則以鋪排詠物多而涉及時事者少。錢起的歌行如〈瑤瑤杯歌〉、〈紫參歌〉，獨孤及〈同岑郎中屯田韋員外花樹歌〉，畢耀〈情人玉清歌〉，賈耽〈賦虞書歌〉，竇庠〈于闐鐘歌靈徹上人歸越〉，顧況〈梁廣畫花歌〉、〈苔蘚山歌〉，張建封〈酬韓校書愈打毬歌〉，盧綸〈和趙給事白蠅拂歌〉、〈慈恩寺石磬歌〉等都是詠物應酬之作。韋應物〈夏冰歌〉從各種角度寫冰之後，從「咫尺炎涼變四時，出門焦灼君詎知」轉出「當念闌干鑿者苦，臘月深井汗如雨」⁵⁸的訓誡。但錢起諸人的詠物歌行在長篇推砌辭藻後很難說有興諷喻託的寓意，甚至還負擔士大夫社交應酬的功能，興諷的功能自然更加稀薄。上文提到的《中興》第一人錢起偶而也有幾首涉及時事的新題歌行或樂府創作，如〈秋霖曲〉和〈效古秋夜長〉的尾巴「白玉窗中聞落葉，應憐寒女獨無衣。」⁵⁹除此之外幾乎找不到其他作品，即使如〈秋霖曲〉這樣的作品，也要在前頭先戴上「君不見聖主旰食憂元元」⁶⁰的帽子，這就大大減低了錢起抨擊時政的力度了。

除以詠物應酬為主的「歌」詩外，考察《全唐詩》還有另一批創作於杜甫前後的新題樂府或歌行在命名或立意上與漢魏樂府存在親緣關係。⁶¹包括張鼎〈鵜城引〉、薛奇童〈雲中行〉、陳季〈鶴警露〉、高適〈部落曲〉、馮著〈燕銜泥〉、戴叔倫〈後宮曲〉、耿漳〈上將行〉、〈仙山行〉、李益〈置酒行〉、〈回軍行〉、顧況、于鵠〈公子行〉、劉長卿〈平蕃曲〉、李益〈來從竇車騎〉、〈促促曲〉、于鵠〈野田行〉以及有較多人同作的〈塞上曲〉、〈塞下曲〉等，它們或自

⁵⁷ 這裡對於歌行的界定是根據松浦友久先生的研究，他認為廣義的歌行可定義為：(1) 不採用擬古樂府題；(2) 沒有樂器伴奏；(3) 具有歌辭性詩題（如歌、行、曲、吟……等）、韻律（雜言、七言）和措辭（蟬聯體、雙擬對……）的歌辭作品。松浦友久，孫昌武，鄭天剛譯，《中國詩歌原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0），〈樂府、新樂府、歌行論〉，頁 287-288。

⁵⁸ 韋應物，〈夏冰歌〉，收入彭定求等奉敕編，《全唐詩》第 6 冊，卷 195，頁 2007。

⁵⁹ 錢起，〈效古秋夜長〉。同前引，第 7 冊，卷 236，頁 2606。

⁶⁰ 錢起，〈秋霖曲〉。同前引，頁 2602。

⁶¹ 葛曉音，《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新樂府的源起和界定〉，頁 186-188。

漢魏舊題衍生而出，或以寓言、謠諺的手法總結人生經驗，或取法漢魏樂府的命題方式，均可上追漢魏古樂府的創作傳統。但若以白居易新樂府必須諷刺時事的標準來看這批作品，卻未必符合後設的「新樂府」，亦即杜甫「憂庶黎」的理念。以《樂府詩集》所列，產生於張籍、王建以前的新題樂府或歌行為例，元結的〈系樂府〉十二首序云：「盡歡怨之聲者，可以上感於上，下化於下」，⁶² 力圖上接《詩經》「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的傳統，但十二首亦只有〈貧婦辭〉、〈去鄉悲〉和〈農臣怨〉傷民病，更多的還是元結自己的抒懷寫志。況且這種要「下以風刺上」來抨擊朝政的理想，當代響應者甚少。戴叔倫〈後宮曲〉說的是長門故事，可說是從古題〈長門怨〉化出。顧況、于鵠〈公子行〉描寫公子生活的豪奢，但能否藉鋪排的描寫達到「戒奢」的目的則不甚明確。劉長卿三首〈平蕃曲〉都是四句成篇的短詩，各寫塞外一景，大抵不出傳統邊塞詩的描寫模式。〈促促曲〉是李益「效古促促曲為河上思婦作」，內容只在遊子思婦之思。司空曙〈塞上〉不脫塞外風光的描寫，缺乏對於現實的批判。耿湋的同題〈塞上曲〉和戎昱〈塞下〉六首比較值得注意，無論是設聲老兵「懶說疆場曾大獲，且悲年鬢老長征」，⁶³ 或是「傍岸砂礫堆，半和戰兵骨」，⁶⁴ 這些時代的少數聲音已表露對於士卒的同情與反戰思想。另有些未收錄在《樂府詩集》的新題歌行如李益〈回軍行〉「表請回軍掩塵骨，莫教士卒哭龍荒」，⁶⁵ 觀察視角與張籍〈將軍行〉「邊人親戚曾戰沒，今逐官軍收舊骨」⁶⁶ 類似。戴叔倫〈女耕田行〉「去年災疫牛囤空，截絹買刀都市中」⁶⁷ 和王建〈田家行〉「不望入口復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⁶⁸ 都已在動盪的時代當中觸及社會底層的心理。其他又如元結〈舂陵行〉、錢起〈秋霖曲〉、戴叔倫〈屯田詞〉、〈邊城曲〉、李端〈瘦馬行〉、劉灣〈雲南行〉等，也有較為強烈的時事針對性，但此類作品在中唐前期以前都只是零星的創作，沒有得到集中的發揮。

另有零星不帶歌辭性或仿古樂府題目的作品，其表現方式與樂府相似，與那些站在「良二千石」角度的作品相比，它們更直接地反映某種社會現象。盧綸〈逢病軍人〉「行多有病住無糧，萬里還鄉未到鄉。蓬鬢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氣入金

⁶² 元結著，聶文郁注解，《元結詩解》，〈系樂府〉十二首序，頁122。

⁶³ 耿湋，〈塞上曲〉，收入彭定求等奉敕編，《全唐詩》第8冊，卷269，頁2999。

⁶⁴ 戎昱著，臧維熙注，《戎昱詩注》，〈塞下〉，頁2。

⁶⁵ 李益，〈回軍行〉，收入彭定求等奉敕編，《全唐詩》第9冊，卷283，頁3227。

⁶⁶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上冊，卷1，〈將軍行〉，頁92。

⁶⁷ 戴叔倫，〈女耕田行〉，收入彭定求等奉敕編，《全唐詩》第9冊，卷273，頁3070。

⁶⁸ 王建著，尹占華校注，《王建詩集校注》，卷2，〈田家行〉，頁49。

瘡」、⁶⁹〈村南逢病叟〉「雙膝過頤頂在肩，四鄰知姓不知年。臥驅烏雀惜禾黍，猶恐諸孫無社錢」、⁷⁰李端〈宿石澗店聞婦人哭〉「山店門前一婦人，哀哀夜哭向秋雲。自說夫因征戰死，朝來逢著舊將軍」，⁷¹均表達對於底層人民的同情。耿漳〈代園中老人〉「傭賃雖堪一身老，皤皤力役在青春。林園手種唯吾事，桃李成陰歸別人」，⁷²或是張謂〈代北州老翁答〉「負薪老翁往北州，北望鄉關生客愁。自言老翁有三子，兩人已向黃沙死。……」，⁷³這類「代 XX」雖沒有歌辭性題目，但實際上是以代言體的聲口表達對於黎元生活之關懷，以第三人稱為詩歌的抒情主體本就是漢魏樂府區分於古詩的最重要特徵，這類詩歌除了題目外，其體制和內容都與漢魏古樂府類似。張謂的作品還可以和張籍的七絕〈鄰婦哭征夫〉作一比較。張詩云：「雙鬢初合便分離，萬里征夫不得隨。今日軍回身獨歿，去時鞍馬別人騎。」⁷⁴以鄰婦的聲口抒情，這和張謂的表現手法一致，除了題目外，它們都可被視作樂府。只是這類詩歌在中唐前期極少，同樣的主題，張籍更喜歡用典型的樂府題表達，如〈征婦怨〉或〈別離曲〉。儘管杜甫已有不少關注時事的新題樂府歌行符合白居易所謂「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標準，但除了韋應物和元結少數作品外，杜甫的追隨者甚稀，安史之亂所帶來的重大傷害已使得中唐前期的部分詩人意識到「窮年憂庶黎」的主題，只是他們關注的層面不如後來的張王、元白之廣，大多只是出於對底層的同情，因此甚少對社會不合理的現象提出解釋，更遑論直接抨擊朝政了。⁷⁵

不過這類作品的觀察視角或表現方式還是為樂府作者所吸收，盧綸對病軍人「不堪秋氣入金瘡」的特寫到了王建〈古從軍〉就成了「回面不見家，風吹破衣

⁶⁹ 盧綸，〈逢病軍人〉，收入彭定求等奉敕編，《全唐詩》第9冊，卷277，頁3147。

⁷⁰ 盧綸，〈村南逢病叟〉。同前引。

⁷¹ 李端，〈宿石澗店聞婦人哭〉。同前引，卷286，頁3281。

⁷² 耿漳，〈代園中老人〉。同前引，第8冊，卷269，頁3003。

⁷³ 張謂，〈代北州老翁答〉。同前引，第6冊，卷197，頁2016。這首詩除了沒有歌辭性題目外，老翁為第三人稱抒情主人翁，訴說戰爭對他的家庭所造成的傷害，且在最後總結「安邊自合有長策，何必流離中國人」，直接表達對於朝政的不滿，實已符合新樂府的所有特徵。

⁷⁴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中冊，卷6，〈鄰婦哭征夫〉，頁704。

⁷⁵ 大曆詩歌偶有涉及地方的民生描述，如皇甫冉（案：一作劉長卿）〈送鄒判官赴河南〉或是獨孤及〈送相里郎中赴江西〉等，但這類作品畢竟只是大曆詩壇的少數，描寫的目的也只在勉勵友人到任後勤勤王事，絕少涉及對於造成這些動亂的朝政的抨擊。大曆詩人所體驗的文人理想是謝朓式的「吏隱」，這種想法在時人的作品中隨處可見，比如崔峒「郡樓多逸興，良牧謝玄暉」（〈登潤州芙蓉樓〉）、韓翃「風流好繼謝宣城」（〈送夏侯侍郎〉）、「到官無一事，清淨有諸侯」（〈贈長洲何主簿〉）等。作品大多著重於細緻的物色描寫但卻無關「風俗」，只是聚焦在尖新的詩句上，並在「青山白雲」、「春風芳草」的巧構形似中凸顯其「吏隱」的姿態。

服。金瘡在肢節，相與拔箭鏃」⁷⁶ 的慘狀；李端筆下喪夫的婦女再往極端的處境推，就是張籍〈征婦怨〉「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畫燭」；⁷⁷ 北州老翁「如今小兒新長成，明年聞道又徵兵。定知此別必零落，不及相隨同死生」⁷⁸ 和王建〈遼東行〉「年年郡縣送征人，將與遼東作丘阪」⁷⁹ 其實也就是一個意思，只是張、王更自覺地將這類題材和樂府的傳統相結合，創作數量也遠多於同時代的詩人。杜甫和韋應物以新題樂府歌行的形式「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但這種創作模式在杜、韋之後，張、王以前沒有得到集中的發展。

杜甫和韋應物以時事關懷為主要內容的新題歌行是時代的非主流，在元白新樂府成立以前，只有張王樂府延續了杜甫所開創的這條路線。《漢書·藝文志·詩賦略》云：「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⁸⁰ 樂府的起源本與現實密切相關，漢樂府雖直接表現民間的生活與情感，但朝廷采風、觀風之主要目的在於存恤鰥寡孤獨和考察地方吏治，亦即「美刺」的重點在於地方政治，目的還是為了鞏固中央王權。故漢代的民間謳謠雖不排除有抨擊朝政的可能，但卻不是作為中央官署的「樂府」所要採集的對象，這也是現存「漢樂府」雖能反映下層人民的聲音，具有強烈的現實批判精神，但其批判範圍甚少涉及中央朝政的原因。⁸¹ 盛、中唐之際，杜甫等詩人借鑑漢樂府的命題與立意方式，創作一批具有時事針對性的新題樂府或歌行，實際上是在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基礎上，深化「美刺」中「刺」的內涵。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唐新樂府詩人並非單純地重複漢樂府的主題，而是進一步擴大其現實關懷的範圍。因此白居易「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⁸² 在主觀上否定漢設置「樂府」的客觀事實，主張直接繼承《詩經》的傳統，應該就是看出漢樂府針砭時事的力度不及他對於「新樂府」的理想，因此要訴諸在他看來

⁷⁶ 王建著，尹占華校注，《王建詩集校注》，卷3，〈古從軍〉，頁112。

⁷⁷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上冊，卷1，〈征婦怨〉，頁15。

⁷⁸ 張謂，〈代北州老翁答〉，收入彭定求等奉敕編，《全唐詩》第6冊，卷197，頁2016。

⁷⁹ 王建著，尹占華校注，《王建詩集校注》，卷1，〈遼東行〉，頁14。

⁸⁰ 班固，《漢書》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30，〈藝文志·詩賦略〉，頁1756。

⁸¹ 「漢樂府中反映社會問題的篇章集中為兩大類，一類是表現孤兒、病婦、鰥夫、流民、士卒的痛苦生活，如《病婦行》、《孤兒行》、《東門行》、《艷歌行》、《戰城南》等；一類是刺美郡守，如《陌上桑》、《平陵東》、《雁門太守行》等，這是因為漢樂府觀風采風的基本內容是以存恤鰥寡孤獨和考察郡縣吏治為主，也就是說，漢樂府美刺的重點是在地方政治，……直接抨擊時事的作品在漢樂府中極為罕見。」葛曉音，《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頁19。

⁸² 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第1冊，卷4，〈采詩官〉，頁443。

現實批判精神更為強烈的《詩經》。但白居易的理念並非獨創，張籍「千年譜曲不分明，樂府無人傳正聲」⁸³和杜甫「別裁偽體親風雅」，⁸⁴都是要將詩歌溯源到《詩經》的傳統，張籍「千年譜曲不分明」的論斷，更和白居易「洎周衰秦興，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泄導人情」⁸⁵的看法一致。張、王延續杜甫模仿漢魏古題，並以「行」詩關懷現實的創作模式。張籍的新題歌詩和行詩共十三首，「歌」僅占一首，王建新題歌詩和行詩十一首，「歌」詩僅有兩首，張、王集中創作「行」詩以美刺時事或書寫風俗，均表達較為強烈的現實關懷而與當時詩壇的主流有異。張、王作於貞元年間的〈永嘉行〉藉永嘉亂事刺廣德元年(763)吐番入侵長安事，〈將軍行〉感嘆一將功成萬古枯，〈廢宅行〉寫戰亂後民居的淒涼，〈洛陽行〉對比洛陽宮殿在戰前戰後的風光與沒落，〈寒食行〉和〈北邙行〉涉及地方風俗，〈水運行〉抨擊朝廷供糧政策的不合理等，都是就中唐社會現象之一端而發。張、王多作「行」詩而罕見「歌」詩本身就和大曆詩壇的創作取向相反。他們自創新題「行」詩以為時事服務，則又見在「歌」、「行」的職能分工上，他們對以「行」詩來采風刺時的創作當亦是有所自覺的。

在杜甫、韋應物之後，張、王更進一步讓「行」詩以外的樂府題也走向關懷現實的道路。張、王在「行」詩以外尚有不少其他歌辭性樂府題，〈征婦怨〉寫丈夫戰死子尚在腹的婦女，〈促促詞〉沉重的賦稅導致夫妻分離，〈牧童詞〉諷刺官家對人民的壓迫，〈促刺詞〉寫年老不歸夫家的婦女，〈簇蠶辭〉蠶農辛勤工作卻無法享受成果，〈水夫謠〉寫水夫工作的困難，最後竟說出「我願此水作平田，長使水夫不怨天」⁸⁶的極端語來。如果將這類歌辭性題目如「怨」、「曲」、「辭」、「謠」等和郭茂倩《樂府詩集》的題目作一番排比，可以推測張、王以這些歌辭性新題表達對於時事的關心，是在杜甫「歌」、「行」分工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樂府和時事的關聯。《樂府詩集》「曲」詩最多者，是雜曲歌辭，計三十一題，⁸⁷以及以保留南朝樂府民歌為主體的清商曲辭，共計十八題。張籍〈江南曲〉等作品確也吸取了南朝樂府的傳統，但是他擺脫了南朝樂府豔情的內容，書寫

⁸³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下冊，卷7，〈廢瑟詞〉，頁847。

⁸⁴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註》第2冊，卷11，〈戲為六絕句之六〉，頁901。

⁸⁵ 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第1冊，卷8，〈與元九書〉，頁322。

⁸⁶ 王建著，尹占華校注，《王建詩集校注》，卷2，〈水夫謠〉，頁48。

⁸⁷ 三十一題中〈南征曲〉、〈西州曲〉、〈長干曲〉、〈攜手曲〉、〈夜夜曲〉、〈江上曲〉、〈江皋曲〉、〈楊花曲〉、〈桃花曲〉、〈映水曲〉、〈登樓曲〉、〈越城曲〉、〈迎客曲〉、〈送客曲〉、〈送歸曲〉等都是南朝樂府。

地方風俗為「觀民風」的理想服務。至於「謠」、「辭」則被大量保留在以民間歌謠、童謠為主的雜歌謠辭當中。對比杜甫從相和歌辭、鼓吹曲辭和雜曲歌辭中取法漢魏古題，張王新題樂府兼及南朝民歌和民間謠諺，並改造南朝綺麗艷情的歌曲風格以及謠諺多雜讖緯的內容來為時事民生服務。

「歌」詩和「行」詩的分工在杜甫手上趨於明確，並由韋應物所延續。但在張、王以前，「歌」詩的數量遠多於「行」詩，且被大量用於詠物甚至是應酬。另一方面，部分新題歌行無論就內容、表現手法或命題方式都與漢魏樂府相類，這類新題歌行是新樂府發展的土壤，但只是時代的少數。張籍、王建吸收大曆詩人「憂黎元」的觀察角度，用樂府的體裁反映時事甚至抨擊朝政，是在杜甫之後，沿著當時模仿漢魏樂府自創新題歌行的新趨向，集中創作新題樂府的第一組詩人。張籍、王建在杜、韋之後集中創作新題歌行，且將歌行、樂府題和時事三者合一，足以說明張籍、王建對於杜甫理念的發揚。王建「鄉中尚其風，重為修茅茨。聖朝有良史，將此為女師」，⁸⁸ 或白居易「時無采詩官，委棄如泥塵。……願播內樂府，時得聞至尊」⁸⁹ 以及元稹對張籍「雅尚古文，不從流俗，切磨諷興，有助政經」的評價，⁹⁰ 都說明張、王作樂府是希望能被采詩、有助教化的。而張、王希望作詩以著於國史或有助政經的理想，和白居易「但於國史上，全錄元稹詩」⁹¹ 的想法，亦即是新樂府的理想也是一致的。

張籍和王建是元白新樂府興起以前，創作樂府數量最多的一對詩人，他們新舊題樂府並作，一方面延續李白，將初唐律化的古樂府恢復為古體，卻進一步深化樂府「傷民病」的「感於哀樂」傳統，有別於李白以樂府言志的路數；另一方面又接受杜甫的理念，拓展漢樂府的采風範圍，將時事、歌行及取法漢魏的樂府古題結合，拓展其他歌辭性新題的感時傷事性，而使樂府無論新、舊體都走向關懷時事之途，因此，張籍和王建可說是從李、杜到元、白的中介，是元白新樂府興起的前驅。以下即就張王樂府對於稍後元白新樂府的影響加以論述。

⁸⁸ 王建著，尹占華校注，《王建詩集校注》，卷4，〈宋氏五女〉，頁149。

⁸⁹ 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第1冊，卷1，〈讀張籍古樂府〉，頁8。

⁹⁰ 元稹著，周相錄校注，《元稹集校注》下冊，補遺卷4，〈授張籍秘書郎制〉，頁1488。

⁹¹ 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第1冊，卷2，〈和陽城驛〉，頁220。

四、從張王到元白：「新題」樂府的產生

上文論述樂府從李、杜到張、王的發展，下面討論張、王對稍後元白新樂府的影響。要論張王樂府影響元白新樂府，必須首先確認張王樂府創作在元白新樂府之前，而且元、白確實見到張、王的作品。在此基礎上，才能談張、王如何影響了元、白。

張王樂府多作於貞元年間。張籍〈祭退之〉云：「北游偶逢公，盛語相稱明。名因天下聞，傳者入歌聲」，⁹² 寫的是張籍貞元十三年（797）北游汴洲，偶逢韓愈事。張籍在這次會面中得到韓愈的賞識，從此天下聞名。⁹³ 韓愈貞元十五年說張籍：「少知誠難得，純粹古已亡。」⁹⁴ 又〈代張籍與浙東觀察李中丞書〉：「籍又善為古詩，……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⁹⁵ 可見韓愈特別看重張籍「古」的一面，此在詩歌方面就是「古詩」的寫作，當然也包括張籍用古體寫成的樂府，故有所謂「傳者入歌聲」說，因為符合古體並能傳唱者，只有用古體寫成的樂府。又張籍〈贈王秘書〉云：「早在山東聲價遠」、「賦來詩句無閑語」，⁹⁶ 「山東」指的是貞元十六年王建入河北幽州幕府事，「聲價遠」知王建在貞元年間亦有詩名。儘管這裡沒有確指王建是以何種詩體取得名聲，但「無閑語」句正好可以與白居易對張籍樂府「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的評價對讀，那些針對社會現象的樂府理應包括在內。由此可知張籍和王建在元和以前都以樂府創作取得詩名了。

那麼，在貞元時期，張、王究竟是以哪些樂府作品為世所知呢？此須對二人作品加以編年。筆者所作編年考證詳見文末附表，此僅述其要。張籍、王建於建中四年（783）相識於邢州，隨後「鵲山漳水每追隨」、「新作句成相借問」。⁹⁷ 兩人

⁹²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下冊，卷7，〈祭退之〉，頁913。

⁹³ 韓愈又說：「之子去須臾，赫赫流盛名。」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1，〈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頁84。這也可以和張籍的話互證，說明他最晚在貞元末已有詩名。

⁹⁴ 錢仲聯先生將此詩繫於本年。同前引，頁84-85。

⁹⁵ 韓愈著，劉真倫、岳珍校注，《韓愈文集彙校箋注》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6，〈代張籍與浙東觀察李中丞書〉，頁714。

⁹⁶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中冊，卷6，〈贈王秘書〉，頁466。

⁹⁷ 同前引，卷4，〈逢王建有贈〉，頁479。

在求學期間曾同遊京洛，在貞元八年（792）或稍後分別。此一階段即二人共同求學時期，所謂「新作句成相借問」，故也是二人互相作詩相示、切磋詩藝的時期。貞元年間唐代正值內憂外患，吐蕃、室韋、奚等外族多次寇邊，以致隴右諸地陷。對外戰爭對百姓所造成的苦難充分的體現在張、王的樂府作品當中，張籍〈西州〉、〈關山月〉、〈妾薄命〉、〈築城詞〉、〈塞上曲〉、〈征婦怨〉和〈魚陽將〉，王建〈涼州行〉、〈關山月〉、〈送衣曲〉、〈遼東行〉、〈渡遼水〉等，都是此一時期這個主題的代表作。而戰爭和藩鎮坐大帶來各種社會亂象也激發張籍〈少年行〉、〈猛虎行〉，王建〈羽林行〉、〈射虎行〉的創作。張籍〈洛陽行〉「御門空鎖五十年」知其貞元初年從至洛陽一帶，留下〈永嘉行〉、〈董逃行〉、〈北邙行〉與〈廢宅行〉等作，王建貞元年間也到過長安、洛陽一帶，有〈北邙行〉、〈羽林行〉等作品留下。張籍早年曾居住或漫遊江南，王建學成後亦曾到過荊南一帶，時間約在貞元十四年前後，這些經驗也在他們的樂府留下痕跡，可以張氏〈採蓮曲〉、〈賈客樂〉、〈江南曲〉、〈江村行〉、〈遠別離〉，王氏〈荊門行〉、〈水夫謠〉、〈水運行〉等為代表。此外，張籍尚未取得功名以前在江南、河北、荊湘一帶遊歷，也有〈各東西〉、〈羈旅行〉等自我經歷之寫照的作品創作。由以上的排比可知，張、王在貞元年間已累積為數眾多的樂府詩創作。

貞元八年以後，張籍到長安求人薦舉，王建則入幕職。貞元十二年，張籍由薊北歸蘇州，途中曾訪王建。到元和八年（813）兩人「十八年來恨別離，唯一同宿詠新詩」，⁹⁸ 長別後相聚。王建要到元和十三年才在京任太府寺丞，雖也有機會與張籍詩文唱和，但總的來說，張、王後期詩歌已不復早年銳氣，「芸閣水曹雖最冷，與君常喜得身閑」、⁹⁹「身愛無一事，心期往四明」¹⁰⁰ 等詩句可以體現張、王晚年心境。故張王樂府創作的高峰期乃在貞元年間。

張王樂府多數作於貞元年間以後，元白樂府則成於元和四年，從時間上說乃在張王之後。那麼，如何證明元白受張王影響呢？張籍與白居易訂交約在元和二年（807），此時張籍已有詩名，由此可以推斷白氏最遲在本年就已見過張籍的作品。白居易元和九年曾美張籍，云其：「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學仙詩，可諷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上可裨教

⁹⁸ 同前引，〈喜王六同宿〉，頁 661。

⁹⁹ 同前引，〈酬秘書王丞見寄〉，頁 436。

¹⁰⁰ 賈島，〈宿姚合宅寄張司業籍〉，收入彭定求等奉敕編，《全唐詩》第 17 冊，卷 573，頁 6672。

化，舒之濟萬民。……」¹⁰¹ 可見白居易特別重視張籍那些具有「教化」或「諷諭」功能的樂府作品。元稹〈授張籍秘書郎制〉：「《傳》云：『王澤竭而詩不作。』又曰：『采詩以觀人風。』斯亦警予之一事也。以爾〔張〕籍雅尚古文，不從流俗，切磨諷興，有助政經。」¹⁰² 雖然籠統地標榜張籍的「古文」，但從引文都從「詩」的角度切入來看，所謂「古文」包括張籍的詩，而「采詩以觀人風」更與樂府的起源密切相關，應被包括在內。元稹同樣看重張籍那些具有「諷興」政治功能的古體樂府作品。王建於元和末年才到長安任職，與韓愈、白居易等人的交往不如張籍密切，儘管文獻無足徵，目前沒有看到元、白對王建樂府的評價，但從王建的創作實踐與貞元八年〈送張籍歸江東〉云：「君詩發大雅，正氣回我腸」，¹⁰³ 可見其與張籍要糾正「樂府無人傳正聲」的立場是相通的。「新樂府」所體現的正是元、白所推崇的張籍樂府詩的精神，而這個精神又是張王樂府所共同體現的。同時，張王樂府同唱的創作形式見於稍後的新樂府，其表現方式也為元、白所吸收。從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張籍與其以樂府相唱和的王建曾對元、白的「新樂府」產生影響。誠如陳寅恪先生所言：「樂天之新樂府與文昌之古樂府，其體制雖有不同，而樂天推許文昌古樂府，則曰：『未嘗著空文。』自詡其新樂府，則曰：『篇篇無空文。』是此一要義，固無差別也。又樂天於文昌古樂府則曰：『願播內樂府，時得聞至尊。』自述其作樂府之本志，則曰：『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此其『采詩』、『諷諫』之旨意也。」¹⁰⁴ 白氏樂府與張籍作品在精神旨意上的一致性，正是其受張籍影響的體現，而張籍的樂府並非獨立創作，有相當數量是與王建「新作句成相借問，閒求義盡共尋思」¹⁰⁵ 而成。

五代張洎為張籍編次集子，¹⁰⁶ 理應看過更多張籍的作品，他在《張司業集序》說：「公〔張籍〕為古風最善，自李杜之後，風雅道喪，繼其美者唯公一人，故白太傅讀公集曰：『張公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¹⁰⁷ 正是從樂府的脈絡肯定張籍繼承李、杜的「風雅」傳統。根據張籍的創作實踐以及白居易對他的推崇，張籍對於「風雅」的理解，主要突出的是《詩經》的「諷刺」

¹⁰¹ 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第1冊，卷1，〈讀張籍古樂府〉，頁8。

¹⁰² 元稹著，周相錄校注，《元稹集校注》下冊，補遺卷4，〈授張籍秘書郎制〉，頁1488。

¹⁰³ 王建著，尹占華校注，《王建詩集校注》，卷4，〈送張籍歸江東〉，頁139。

¹⁰⁴ 陳寅恪、元稹撰，《元白詩箋證稿·元氏長慶詩集》（臺北：世界書局，2010），頁298-299。

¹⁰⁵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中冊，卷4，〈逢王建有贈〉，頁479。

¹⁰⁶ 「其集五卷，張洎為之編次。」晁公武著，孫猛校正，《郡齋讀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卷17，〈張籍詩集五卷〉，頁886。

¹⁰⁷ 董誥等奉敕編，《欽定全唐文》（臺北：匯文書局，1961），卷872，頁11505下。

傳統。另一方面，張洎既以李、杜之後，「繼其美者唯公一人」，那麼至少在五代人眼裡，張籍樂府的創作應早於元、白，否則元、白的當代詩名遠高於張籍，若張籍樂府在「新樂府」之後，張洎便不當以「風雅道喪，繼其美者唯公一人」稱之，故張洎所言亦可為盛中唐樂府發展，乃由「李杜」至「張王」再至「元白」之旁證。

張王樂府對元白新樂府的影響亦可以從其作品見出。新樂府的構思與表現方式已在張王樂府初見端倪。首先，張王樂府善於提煉舊題內容，並從中轉出新題。新題〈羈旅行〉在《全唐詩》中惟收張籍和孟郊兩首，根據華忱之先生考訂，孟詩作於貞元八年長安應舉下第時。¹⁰⁸ 又考察張籍生平，知張、王約於貞元八年結束河北求學，王建〈送張籍歸江東〉「行成歸此去，離我適咸陽」¹⁰⁹ 紀錄張籍在學成之後的行蹤，知張籍本年曾至長安周邊，張、孟的〈羈旅行〉當為同唱，故將張籍的新題〈羈旅行〉繫於本年。這首詩云：「遠客出門行路難」、「誰能聽我苦辛行」，¹¹⁰ 「行路難」和「苦辛行」都是樂府古題，張籍似乎有意取「行路難」和「苦辛行」的共同主題，亦即「世路艱辛」的意象來為他的新題樂府服務。這種提煉或借鑑古樂府的資源，並從古題樂府轉出新題的創作手法也見於王建。王建詩「上宰鎮荊州，敬重同歲遊」¹¹¹ 知王氏自河北學成後曾至荊南一帶，時間約在貞元十四年。他的新題〈水夫謠〉以長江流域的勞動為背景，當作於此一時期。詩云「苦哉生長當驛邊」，¹¹² 以「苦哉」領句是古樂府〈從軍行〉所慣用的句法，《樂府詩集》載：

晉陸機《從軍行》曰：「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宋顏延年《從軍行》曰：「苦哉遠征人，畢力幹時艱。」蓋苦天下征伐也。又有《苦哉行》、《遠征人》，皆出於《從軍行》也。¹¹³

又唐戎昱〈苦哉行〉寫「狂胡」征伐事，云：「苦哉難重陳，暗哭蒼蒼天。」¹¹⁴ 推測這種「苦哉」的句式當是〈從軍行〉及其衍生題的典型表現手法。而〈苦哉

¹⁰⁸ 華忱之，〈唐孟郊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0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頁 403。

¹⁰⁹ 王建著，尹占華校注，《王建詩集校注》，卷 4，〈送張籍歸江東〉，頁 139。

¹¹⁰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中冊，卷 1，〈羈旅行〉，頁 98。

¹¹¹ 王建著，尹占華校注，《王建詩集校注》，卷 4，〈荊南贈別李肇著作轉韻詩〉，頁 132。

¹¹² 同前引，卷 2，〈水夫謠〉，頁 47。

¹¹³ 郭茂倩，《樂府詩集》第 2 冊，卷 33，頁 492。

¹¹⁴ 戎昱著，臧維熙注，《戎昱詩注》，〈苦哉行〉，頁 6。

行〉既從〈從軍行〉轉出，此題內容在創作源頭上應出於軍旅征伐之事。王建〈水夫謠〉借用「苦哉」的典型句式，開宗明義云：「苦哉生長當驛邊，官家使我牽驛船」，細緻地刻劃水夫艱難的生存條件，就「苦哉」的字面意義加以發揮，帶入全新的主題，而與傳統的征伐意旨無關，說明王建拓展古題意象，從舊題轉出新題新意的構思手法與張籍是一致的。

類似的表現尚可見張、王同唱的〈北邙行〉。《全唐詩》〈北邙行〉惟收張、王兩首，當為同唱。「北邙」的意象見於張、王以前的諸多作品，如孟雲卿〈古挽歌〉「北邙路非遠，此別終天地」，¹¹⁵ 以及顧況〈行路難〉「君不見古人燒水銀，變作北邙山上塵」，¹¹⁶ 均與送葬活動相關。張籍、王建就此衍生樂府新題〈北邙行〉，¹¹⁷ 並從挽歌轉出對生死的思考，其中張籍「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誰家柱下石。山頭松柏多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¹¹⁸ 和王建「車轍廣若長安路，蒿草少於松柏樹。澗底盤陀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¹¹⁹ 立意極端，也有另一首提到北邙的作品作為前鑑：「北邙不種田，但種松與柏。松柏未生處，留待市朝客」。¹²⁰ 新題〈北邙行〉的出現是在前人創作傳統的基礎上衍生而出。

儘管新樂府主張「即事名篇，無復依傍」，但新樂府無論是在命名或內容上，仍見借鑑他作的痕跡。據陳寅恪先生考證，白居易〈驪宮高〉的命名來自〈長恨歌〉「驪宮高處入青雲」，¹²¹ 足見白氏新題的產生是就舊作的一端發揮而成。又〈道州民〉頗疑受到元稹〈陽城驛〉的啟發。¹²² 元氏〈陽城驛〉「商有陽城驛，名同陽道州」，¹²³ 旨在歌詠陽城的地方長官陽城，白居易〈和陽城驛〉詩：「商山陽城驛，中有歎者誰。云是元監察，江陵謫去時」，¹²⁴ 正是針對元稹詩而發。陽城事跡見《舊唐書·隱逸傳》：

¹¹⁵ 孟雲卿，〈古挽歌〉，收入彭定求等奉敕編，《全唐詩》第5冊，卷157，頁1607。

¹¹⁶ 顧況，〈行路難〉。同前引，第8冊，卷265，頁2942。

¹¹⁷ 張、王〈北邙行〉《全唐詩》僅見兩首，考察二人生平，應為唱和之作。

¹¹⁸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上冊，卷1，〈北邙行〉，頁77。

¹¹⁹ 王建著，尹占華校注，《王建詩集校注》，卷1，〈北邙行〉，頁8。

¹²⁰ 沈千運，〈古歌〉，收入彭定求等奉敕編，《全唐詩》第8冊，卷259，頁2888。

¹²¹ 陳寅恪、元稹撰，《元白詩箋證稿·元氏長慶詩集》，頁216。

¹²² 「觀白氏長慶集貳和答詩十首第貳首為和陽城驛，其序略云：『〔元和〕五年春，微之從東臺〔東都洛陽御史臺〕來。不數日，又左轉為江陵士曹掾。及到江陵，寄在路所為詩十七章。』可知，頗疑樂天此作與其和微之陽城驛詩有關。蓋受此暗示，因詠貞元時事，而並及之也。」同前引，頁196。

¹²³ 元稹著，周相錄校注，《元稹集校注》上冊，卷2，〈陽城驛〉，頁37。

¹²⁴ 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第1冊，卷2，〈和陽城驛〉，頁219。

在道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戶貢其男，號為「矮奴」。城不平其以良為賤，又憫其編氓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¹²⁵

除了古詩唱和外，白氏還有新樂府〈道州民〉站在道州人民的角度看陽城的德政：「道州民，民到於今受其賜，欲說使君先下淚。」元稹古詩頌之在前，白居易以古詩和樂府同唱於後，〈道州民〉的創作應有感於元稹之頌詞。又陳寅恪先生以〈上陽白髮人〉受竇庠〈陪留守韓僕射巡內至上陽宮感興〉之類的作品啟發而作，「則李公垂或亦乘此類機會感興成詩，否則雖在東都，似亦無緣進入宮禁之內也。」¹²⁶李紳的原作今已失傳，然竇庠絕句猶存：「翠輦西歸七十春，玉堂珠綴儼埃塵。武皇弓劍埋何處，泣問上陽宮裡人。」¹²⁷根據「上陽宮裡人」語，李紳的新樂府題很可能是從竇庠這類的作品中轉出再由元、白唱和。可見新樂府的命題並非憑空而來，亦有借鑑前作資源處，而這種創作方式已先見於張王新題。

其次，就樂府內容觀之，張王樂府同唱往往能從古題中轉出新意，並從不同角度展開社會的亂象。張籍〈少年行〉：「遙聞虜到平陵下」，「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當以貞元七年吐蕃入寇長安西北的慶州事為背景。詩云：「少年從獵出長楊，禁中新拜羽林郎」，對於少年意氣風發之描寫是此題的慣常內容，但張詩結尾「斬得名王獻桂宮，封侯起第一日中。不為六郡良家子，百戰始取邊城功」，¹²⁸已注意到少年成功之容易，對比六郡子弟的辛勞，則有含蓄的諷刺意味。王建從漢樂府〈羽林郎〉延伸出〈羽林行〉，但不同於古辭本事「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王詩「百回殺人身合死，赦書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鄉吏籍中重改姓。出來依舊屬羽林，立在殿前射飛禽」，¹²⁹更像是張籍〈少年行〉主題的再延伸。張籍站在六郡良家子的角度對少年進行批判，本身就是一種題材上的創新；王建的〈羽林行〉可以說是從古題〈羽林郎〉轉出新意，但在內容上卻與張詩呼應，〈少年行〉和〈羽林郎〉似乎在唐人手中合流，曾經意氣風發的少年和仗勢欺人的

¹²⁵ 劉昫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192，〈隱逸傳〉，頁5133-5134。

¹²⁶ 陳寅恪、元稹撰，《元白詩箋證稿·元氏長慶詩集》，頁163。

¹²⁷ 竇庠，〈陪留守韓僕射巡內至上陽宮感興〉二首之一，收入彭定求等奉敕編，《全唐詩》第8冊，卷271，頁3047。

¹²⁸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上冊，卷1，〈少年行〉，頁83-84。

¹²⁹ 王建著，尹占華校注，《王建詩集校注》，卷2，〈羽林行〉，頁76。

羽林郎都被置於一個更大的社會現象中，亦即是唐代軍功分配之不公。此外，張籍〈少年行〉從「少年」的角度是「不為六郡良家子，百戰始取邊城功」，但若從「良家子」的立場出發，就有了〈妾薄命〉：「薄命嫁得良家子，無事從軍去萬里。漢家天子平四夷，護羌都尉裹尸歸。」¹³⁰ 由《新唐書·吐蕃傳上》「吐蕃本西羌屬」¹³¹ 可知，這首詩亦是以安史亂後到貞元年間吐蕃入寇為背景。〈少年行〉和〈妾薄命〉互文對讀，體現亂世中各類人物的生存處境。類似的表現尚見張、王〈促促詞〉和〈促刺詞〉從不同角度突出唐代底層婦女的悲慘遭遇；〈猛虎行〉和〈射虎行〉共寫藩鎮之亂等，亂世中的各種圖景在張、王的唱和中得到較大幅度的開展。

張王樂府在題材上彼此影響，就對方或自己作品的一端發揮，從中展現樂府的新意，這種手法也見於稍後元白新樂府。陳寅恪先生已指出白居易〈李夫人〉可做為長篇歌行〈長恨歌〉的注腳；¹³² 〈陵園妾〉與〈上陽白髮人〉的詩旨雖異，但同以幽閉宮女為描寫對象，則在構思上自可相互參見等。事實上，〈長恨歌〉「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¹³³ 也可以是〈上陽白髮人〉「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妒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¹³⁴ 的反面。新樂府這種互文見義的創作手法已在張王樂府初見端倪。其次，元稹、白居易的新樂府本是和李紳的新樂府題二十首，李作今已不傳，然今存元白詩集尚可見有多首同題之作，如〈上陽白髮人〉、〈華原磬〉、〈胡旋女〉和〈法曲〉等，在這些同題新樂府中，元、白敘寫的角度或有不同，但都意在刻劃一個時代下的某種現象，以〈上陽白髮人〉為例，白居易寫上陽宮女甫入宮便受楊貴妃打壓入冷宮，最終只得「大家遙賜尚書號」的虛名，是以「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

¹³⁰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上冊，卷1，〈妾薄命〉，頁105。

¹³¹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第19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216上，〈吐蕃傳上〉，頁6071。

¹³² 「樂天之長恨歌以『漢皇重色思傾國。』為開宗明義之句，其新樂府此篇，則以『不如不遇傾城色。』為卒彰顯志之言。其旨意實相符同，此亦甚可注意者也。故讀長恨歌必須取此篇參讀之，然後使能全解。蓋此篇實可以長恨歌著者自撰之箋注視之也。」「此篇〔陵園妾〕既敘宮女幽閉之情事，自可與上陽白髮人一篇相參證。如詩中：『憶昔宮中被妬猜，因讒得罪配陵來。』之句，殆受上陽白髮人李傳所言：『楊貴妃專寵，後宮人無復進幸矣。六宮有美色者，輒置別所。』之暗示而來，而樂天上陽白髮人詩云：『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妬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陵園妾篇中此語自亦與之有關，可無疑也。」陳寅恪、元稹撰，《元白詩箋證稿·元氏長慶詩集》，頁264、266。

¹³³ 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第2冊，卷12，〈長恨歌〉，頁943。

¹³⁴ 同前引，第1冊，卷3，〈上陽白髮人〉，頁298。

何」；¹³⁵ 元詩則將安史之亂的背景帶入，「御馬南奔胡馬蹙，宮女三千合宮棄。宮門一閉不復開，上陽花草青苔地」，最後建議「如何決壅順眾流，女遣從夫男作吏」。¹³⁶ 元、白就同一現象的不同面相各自書寫，表達他們「為時而作」的詩教關懷，然以樂府唱和始自張、王，在唱和中提高一個事件所能涵蓋的內容，甚至是唱和增強作品的影響力，這是元、白對於張、王的借鑑之處，由此亦可看出張、王對於新樂府的作用。

最後，比較張王、元白兩組詩人的作品，還可以從藝術表現方式發現張王、元白的相承之處。從作品的構思來說，白居易〈新豐折臂翁〉描寫老翁在天寶年間自折一臂以逃兵役事，詩云：「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呦呦。」¹³⁷ 戰士全軍覆沒無人收骨的慘況，和張籍描寫貞元年間奚族入侵的〈征婦怨〉「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¹³⁸ 立意實有相似處。¹³⁹ 又如白居易〈城鹽州〉「如今邊將非無策，心笑韓公築城壁。相看養寇為身謀，各握強兵固恩澤」¹⁴⁰ 和王建〈射虎行〉「遠立不敢污箭鏃，聞死還來分虎肉。惜留猛虎著深山，射殺恐畏終身閒」¹⁴¹ 說的是一個意思，只是前者說得更加明確。再就單句詩歌的構思而言，元稹〈縛戎人〉「煙塵亂起無亭燧，主帥驚跳棄旄鉞。半夜城摧鵝雁鳴，妻啼子叫曾不歇」¹⁴² 令人聯想起貞元初年張籍在洛陽寫下的〈永嘉行〉「公卿奔走如驅羊。紫陌旌旛暗相觸，家家雞犬驚上屋。婦人出門隨亂兵，夫死眼前不敢哭」。¹⁴³ 王建以吐蕃入寇為背景的〈涼州行〉「蕃人舊日不耕犁，相學如今種禾黍。驅羊亦著錦為衣，為惜氈裘防鬪時。養蠶織繭成匹帛，那堪繞帳作旌旗。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¹⁴⁴ 之後的故事，不正可以由元稹〈法曲〉「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咸洛。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

¹³⁵ 同前引。

¹³⁶ 元稹著，周相錄校注，《元稹集校注》中冊，卷 24，〈上陽白髮人〉，頁 718。

¹³⁷ 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第 1 冊，卷 3，〈新豐折臂翁〉，頁 309。

¹³⁸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上冊，卷 1，頁 15。

¹³⁹ 《唐宋詩醇》卷二十云：「大意亦本之杜甫〈兵車〉、〈前〉、〈後出塞〉等篇。」固是。但除了無人收戰骨的悲慘命運是張、白所用的共同意象外，白作「萬人冢上哭呦呦」和張作「家家城下招魂葬」更像是對戰亡將士與故里鄉親的兩面書寫。清高宗御選，《唐宋詩醇》第 3 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頁 576。

¹⁴⁰ 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第 1 冊，卷 3，〈城鹽州〉，頁 329。

¹⁴¹ 王建著，尹占華校注，《王建詩集校注》，卷 2，〈射虎行〉，頁 78。

¹⁴² 元稹著，周相錄校注，《元稹集校注》中冊，卷 24，〈縛戎人〉，頁 741。

¹⁴³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上冊，卷 1，〈永嘉行〉，頁 64。

¹⁴⁴ 王建著，尹占華校注，《王建詩集校注》，卷 1，〈涼州行〉，頁 1。

樂。……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¹⁴⁵ 補上嗎？又比如元稹於元和十二年所作的古題樂府〈估客樂〉「市卒酒肉臭，縣胥家舍成」及「小兒販鹽鹵，不入州縣征。一身偃市利，突若截海鯨」，¹⁴⁶ 不正是將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¹⁴⁷ 的句式和張籍作於貞元十二年以前的〈賈客樂〉「年年逐利西復東，姓名不在縣籍中」¹⁴⁸ 的意思擰合再加以發揮嗎？這些例子說明，張王樂府對於元白新樂府在語言藝術上的影響。

五、結論：張王樂府與唐代新樂府的產生

文學史家論唐代樂府詩史，一向以元白新樂府直接元結、杜甫。但筆者以為，從李、杜、元結到元、白，中間尚有一個重要的環節，那就是張、王。從杜甫「別裁偽體親風雅」到張籍、王建「千年曲譜不分明，樂府無人傳正聲」、「賦來詩句無閒語」或是「君詩發大雅，正氣回我腸」，再到白居易推崇張籍「未嘗著空文」，又說自己的新樂府「篇篇無空文」，正好連成一條盛、中唐樂府的發展脈絡。杜甫雖然沒有明言「風雅」為何，但從他推崇元結〈春陵行〉「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來看，他對於樂府繼承《詩經》「刺時」的傳統是有深刻理解的。稍後的張籍、王建與白居易繼承杜甫的路數，以「興諷刺時」的內涵來理解「風雅」或所謂的樂府「正聲」。張洎《張司業集序》稱美張籍：「為古風最善，自李杜之後，風雅道喪，繼其美者，唯公一人」，正是看出張籍在樂府的脈絡底下，對於李、杜的繼承與新變，除了接續杜甫所開展的新題樂府外，也在李白的復古基礎上更進一步，古樂府從詩人的自我抒情走向社會批判，從而向漢魏樂府「刺上化下」的理想靠攏。張王樂府多有唱和，在唱和的過程中，新題樂府亦隨之生成，這種創作模式亦見於李紳、白居易和元稹的新古樂府創作中。可以說張王樂府通過唱和或彼此啟發並集中創作的方式，深化了樂府關注現實的一面，它的表現手法甚至形成某種慣性而為元和年間的新樂府繼續發展。

（責任校對：王思齊）

¹⁴⁵ 元稹著，周相錄校注，《元稹集校注》中冊，卷24，〈法曲〉，頁727。

¹⁴⁶ 同前引，卷23，〈估客樂〉，頁700。

¹⁴⁷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註》第1冊，卷4，〈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頁264。

¹⁴⁸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上冊，卷1，〈賈客樂〉，頁96。

附表一：張籍樂府編年¹⁴⁹

張籍樂府	新／古樂府	繫年	根據	王建同唱
泗水行	新題樂府	約建中四年 (783)	根據白居易元和十年 (815) 《與元九書》「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倒推五十年，知張籍約生於大曆元年 (766)。又張籍元和八年〈逢王建有贈〉：「經今三十餘年事，卻說還同昨日時」，由本年前推三十一年，則知張、王最晚在建中四年「年狀皆齊初有髭，鵲山潭水每追隨。」張籍沒有在泗水一帶生活的紀錄，根據《新唐書·地理二》，「泗水」在「河南道」，而張籍少年曾在蘇州居住，因此推測這首詩作於張籍北上河北求學，途經泗水期間，繫於建中四年。	
各東西	新題樂府	建中、貞元年間 (780-805)	詩云：「遊人別，一東復一西」，「出門相背兩不返」當是張籍的自我經歷。案：張籍自元和元年 (806) 任太常太祝後，除長慶元年 (821) 曾使襄陽，便再無遠行的經歷。又觀詩意「山高海闊誰辛苦」，當是取得功名以前事，故繫於早期求學或漫游時期。	
洛陽行	新題樂府	貞元初年 (785-)	詩云：「御門空鎖五十年。」唐皇帝最後一次幸東都為開元二十四年 (736)，後推五十年則為貞元元年 (785)，可知張籍在貞元初年曾游洛陽。	
永嘉行	新題樂府	約貞元初年 (785-)	詩云：「黃頭鮮卑入洛陽」，借古諷今，背景當與〈洛陽行〉同，故繫之。	
廢宅行	新題樂府	約貞元初年 (785-)	詩云：「胡馬崩騰滿阡陌，都人避亂唯空宅。」背景當與〈洛陽行〉同，故繫之。	

¹⁴⁹ 由於張籍生平較為清楚，故張王樂府作品編年以徐禮節、余恕誠先生《張籍集繫年校注》所做的工作為基礎，再根據現有史料及王建同唱的現象作考訂，證明張籍、王建曾於建中、貞元年間創作大量樂府，並對元白新樂府產生影響。

張籍樂府	新／古樂府	繫年	根據	王建同唱
董逃行	古題樂府	約貞元初年 (785-)	詩云：「宮城南面有深山，盡將老幼藏其間。」《新唐書·安祿山傳》：「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山谷，東西駱驛二百里，宮嬪散匿行哭，將相第家委寶貨不費，羣不逞爭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剽左藏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又《資治通鑑·唐紀四十四》（案：建中四年）：「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又遣別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官軍數為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谷」，與詩意合。寫作背景當與〈洛陽行〉同，描寫安史亂後洛陽所遭受的連串衝擊，故繫之。	
北邙行	新題樂府	約貞元初年 (785-)	詩云：「洛陽北門北邙道」，《全唐詩》此題唯有張、王兩首，應為和作。當作於張籍早年與王建游寓洛陽期間，創作時間與〈洛陽行〉諸作同。	北邙行 寒食行
征婦怨	新題樂府	貞元四年 (788) 或稍後	詩云：「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舊唐書·北狄傳》：「奚國，蓋匈奴之別種也。」又云：「貞元四年七月，奚及室韋寇振武。十一年四月，幽州奏卻奚六萬餘眾。」案：室韋與奚均在遼水之北，故云。	
別離曲	古題樂府	貞元四年 (788) 或稍後	詩云：「不言身屬遼陽戍」，背景當與〈征婦怨〉同，故繫之。	
西州	新題樂府	貞元七年 (791) 或稍後	詩云：「羌胡據西州，近甸無邊城」。案：《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卷三十九、四十：「〔指吐蕃入侵事〕乾元元年廓州陷；上元二年岷州陷；寶應元年蘭州、河州、鄯州、臨州陷，二年秦州、渭州陷；廣德元年洮州陷，二年涼州陷；永泰二年甘州陷；大曆元年肅州陷，十一年瓜州陷；建中二年沙州陷；貞元七年西州陷。」	

張籍樂府	新／古樂府	繫年	根據	王建同唱
關山月	古題樂府	約貞元七年 (791)	詩云：「隴頭風急雁不下。」又王建有同題同唱云：「金沙嶺西看看沒」，金沙嶺在隴右道，西州交河郡。知為安史亂後，吐蕃陷隴右事，背景當與張籍〈西州〉同。案：西州於貞元七年陷吐蕃，故繫於本年前後。	關山月
少年行	古題樂府	約貞元七年 (791)	詩云：「遙聞虜到平陵下。」根據《三輔黃圖·陵墓》卷六：「昭帝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又《新唐書·本紀七》：「〔貞元七年〕九月，吐蕃寇慶州。」慶州隸屬關內道，也在長安西北，或以此為背景。	羽林行
將軍行	新題樂府， 劉希夷首創	貞元七年 (791) 或稍後	詩云：「彈箏峽東有胡塵，天子擇日拜將軍」，張國光先生《唐樂府詩人張籍生平考證》以為寫劉昌事，當是。《新唐書·劉昌傳》：「貞元三年入朝，……尋授京西行營節度使。歲餘，改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七年，城平涼，開地二百里，扼彈箏峽。又西築保定，扞青石嶺，凡七城二堡，旬日就。」	
塞上曲	古題樂府	貞元七年 (791) 或稍後	詩云：「邊州八月修城堡」，又云：「烏孫國亂多降胡，詔使名王持漢節」。案：《資治通鑑·唐紀四十九》（案：貞元四年）：「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退。」故曰「八月修城堡」以「防秋」。又《舊唐書·迴紇傳》：「貞元七年五月庚申朔，以鴻臚少卿庾鋌兼御史大夫，冊迴紇可汗及弔祭使。」疑所謂「詔使名王持漢節」，故繫之。	
促促詞	新題樂府	貞元八年 (792) 以前	據「江邊」、「吳綉」語，當作於張籍早年居住或漫遊江南之時。又根據王建同唱，時間應不晚於貞元八年，故繫之。	促刺詞

張籍樂府	新／古樂府	繫年	根據	王建同唱
羈旅行	新題樂府	貞元八年 (792)	張籍約在建中四年(783)北上河北求學，又據籍詩「十年為道侶」(〈逢王建有贈〉)知河北求學時間為十年，由建中四年下推十年則為貞元八年。王建有〈送張籍歸江東〉詩云：「行成歸此去，離我適咸陽。失意未還家，馬蹄盡四方。」知張籍在貞元八年以後曾至咸陽，或也曾在長安。此詩云：「身計未成難復返」，又云：「長安陌上相識稀」，正合王建「失意未還家，馬蹄盡四方」語。又孟郊有〈長安羈旅行〉一首，《全唐詩》以新題〈羈旅行〉為題者唯見張、孟兩首，或為和作。孟詩「失名誰肯訪，得意爭相親。」詩意可與張詩呼應。根據華忱之《孟郊年譜》謂郊於貞元八年於長安應舉下第，亦合於張、王分別的時間，故繫之。	
行路難	古題樂府	貞元九年 (793)	詩云：「湘東行人長嘆息，十年離家歸未得。」根據「十年」語，當作於張籍學成之後，歸江東之前，即貞元九年。	
湘江曲	新題樂府	貞元九年 (793)	據「湘江」，背景當與〈行路難〉同，即貞元九年張籍游湘時。	
湖南曲	新題樂府	貞元九年 (793)	據「湖南」，背景當與〈行路難〉同，即貞元九年張籍游湘時。	
江陵孝女	新題樂府	貞元九年 (793)	以「江陵」為題，背景當與〈行路難〉諸作同，即當貞元九年張籍游荊州江陵時。又張籍有詩〈留別江陵王少府〉云：「病客獨行遲」，當是入仕之前所作，亦可證張籍早年曾至江陵。	
築城詞	古題樂府	貞元十年 (794)	《新唐書·吐蕃傳下》：「自虜得鹽州，塞防無以障遏，而靈武單露，鄜、坊侵迫，寇日以驕，數入為邊患。帝復詔城之，……以左神策將軍胡堅、右神策將軍張昌為鹽州行營節度使，板築之，役者六千人，餘皆陣城下。九年始裁，閱二旬訖功。」由詩「來時一年」，則詩作於貞元十年。張國光先生《唐樂府詩人張籍生平考證》以為此詩當以此為背景，當是。	

張籍樂府	新／古樂府	繫年	根據	王建同唱
魚陽將	新題樂府	貞元十一年 (795)	詩云：「放火燒奚帳，分旗築漢城。」案：《新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一年〕十一年四月丙寅，奚寇平州，劉濟敗之于青都山。」詩當以此為背景。	
採蓮曲	古題樂府	貞元十二年 (796) 以前	這首詩描繪江南女子勞動的諸多細節，當是早年居江南時所作。貞元十二年以後，張籍未曾重返江南，故繫之於此年以前。	
賈客樂	古題樂府	貞元十二年 (796) 以前	根據「金陵向西」、「瀟湘」等語推論詩人時在江南、湘東一帶，合於張籍早年漫遊生活，故繫之。	
江南曲	古題樂府	貞元十二年 (796) 以前	這首詩描繪江南風土的諸多細節，當是早年居江南時所作。貞元十二年以後，張籍未曾重返江南，故繫之於此年以前。	
江村行	新題樂府	貞元十二年 (796) 以前	詩云：「江南熱早天氣毒」，當作於張籍早年居住或漫遊江南之時，故繫之。	
遠別離	古題樂府	貞元十二年 (796) 以前	據「蓮葉」、「長江」語及對於江邊之景的描述，背景當為張籍早年居住或漫遊江南之時，故繫之。	
春江曲	古題樂府	貞元十二年 (796) 以前	詩云：「長干夫婿愛遠行」，又云：「妾身生長金陵側」，當作於張籍早年居住或漫遊江南之時，故繫於之。	
雲童行	新題樂府	貞元十二年 (796) 以前	據詩意，當作於張籍早年居住或漫遊江南之時，故繫之。	
送遠曲	古題樂府	貞元十二年 (796) 以前	根據「吳門」語，當作於張籍早年居住或漫遊江南之時，故繫之。	
猛虎行	古題樂府	貞元年間 (785-805)	此題有王建同唱〈射虎行〉，詩云：「惜留猛虎著深山，射殺恐畏終身閑。」據《新唐書·張伯儀傳》：「〔伯儀〕卒，贈揚州大都督。既請謚，博士李吉甫議以『中興三十年而兵未戢者，將帥養寇藩身也。若以亡敗為戒，則總干戈者必圖萬全，而不決戰。若伯儀雖敗，而其忠可錄』。遂謚曰恭。」案：李吉甫於貞元初年拜太常博士，合「中興三十年」之說，詩意似指當時「帥養寇藩身」的現象。又其時張籍、王建同於「鵲山漳水」一帶求學，時以樂府唱和，故繫之。	射虎行

張籍樂府	新／古樂府	繫年	根據	王建同唱
牧童詞	新題樂府	貞元年間 (785-805)	疑指貞元三年，唐德宗與回紇聯盟，請改國號為「回鶻」，此後以沉重經濟損失換取北疆安定事。詩云「陂中飢鳥啄牛背」，「飢鳥」似指改國號之後的「回鶻」。詩又云：「牛群食草莫相觸，官家截爾頭上角。」《新唐書·回鶻上》載：「帝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為昆弟，葉護大喜，使首領達干等先到扶風見子儀，子儀犒飲三日。葉護辭曰：『國多難，我助討逆，何敢食！』固命，乃留。既行，日賜牛四十角、羊八百蹄、米四十斛。」似有諷意。	
征西將	新題樂府	貞元年間 (785-805)	據「碎葉城」語，當指安史亂後至貞元年間吐蕃入侵，隴西地失事。	
妾薄命	古題樂府	貞元年間 (785-805)	據「護羌督尉」語，應以安史亂後到貞元年間吐蕃寇邊，唐王朝喪失隴右地為背景。案《新唐書·吐蕃傳上》云：「吐蕃本西羌屬。」又詩云：「薄命嫁得良家子，無事從軍去萬里。漢家天子平四夷，護羌都尉裹屍歸。」詩意似與〈少年行〉「不同六郡良家子，百戰始取邊城功。」可相呼應，故繫於此一時期。	
隴頭行	古題樂府	貞元年間 (785-805)	詩云：「一朝盡沒隴西地。」寫作背景當與〈西州〉同。《舊唐書·吐蕃傳上》：「乾元之後，吐蕃乘我間隙，日蹙邊城，或為虜掠傷殺，或轉死溝壑。數年之後，鳳翔之西，邠州之北，盡蕃戎之境，湮沒者數十州。」	隴頭水
寄衣曲	新題樂府	貞元年間 (785-805)	詩云：「不得自到邊城裡」，又王建同唱〈送衣曲〉有「隴坂」語，推測當指吐蕃入侵事為背景。	送衣曲
雀飛多	新題樂府	貞元年間 (785-805)	詩云：「雀飛多，觸網羅」、「勿復投身網羅間」。或以《通鑑·唐紀·永貞元年》所記載：「先是，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為橫暴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下不許人出入者，或張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為背景。事當於永貞元年以前，故繫於貞元年間。	

張籍樂府	新／古樂府	繫年	根據	王建同唱
節婦吟	新題樂府	永貞元年 (805) 夏秋 間	根據徐禮節、余恕誠先生考訂，「陸本、席本全詩詩題所謂『李司空師道』，宋洪邁《容齋三筆》（卷六）『張籍陳無己詩』條載為李師古：『張籍在他鎮幕府，郭帥李師古又以書幣辟之，籍卻而不納，而作《節婦吟》一章以寄之。』當是。關於張籍辭辟幣，姚合《贈張籍太祝》云：『甘貧辭辟幣，依選授官資。』知事在元和元年張籍『依選』調補太常太祝前或太祝秩滿而『依選』待授他官時。」	
沙堤行呈 裴相公	新題樂府	長慶二年 (822)	根據徐禮節、余恕誠先生考訂，「事在長慶二年，裴度與元稹有隙而遭李逢吉黨陷害，俱罷相。」	

附表二：王建樂府編年

王建樂府	新／古樂府	繫年	根據	張籍同唱
寒食行	新題樂府	約貞元二 年 (786)	根據「寒食」、「紙錢」、「白骨」語，立意有類張籍〈北邙行〉，疑由此轉出，故繫於同一時期。	
北邙行	新題樂府	約貞元二 年 (786)	根據張籍同唱，《全唐詩》惟錄兩首，故繫於本年。	北邙行
羽林行	古題樂府	約貞元七 年 (791)	這首詩寫「長安」事，根據尹占華先生的考證，王建貞元七年曾至長安，其〈送阿史那將軍安西迎舊使靈柩〉云：「漢家都護邊頭沒」，又云：「卻入杜陵秋巷裡」，前句或指貞元六年楊襲古遇害事，後句則證明王建時在長安，故將此詩繫於貞元七年。詩云：「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劫商樓上醉。」據《通鑑·唐紀·貞元七年》：「禁軍恃恩驕橫，侵暴百姓，陵忽百姓，至詬辱官吏，毀裂案牘。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笞一人，夕貶萬里」，當以此為背景。又詩云「百回殺人身合死，赦書尚有收城功」，與張籍〈少年行〉「少年從獵出長楊，禁中新拜羽林郎。……不同六郡良家子，百戰始取邊城功」似有呼應，故繫為同一時期的作品。	少年行

王建樂府	新／古樂府	繫年	根據	張籍同唱
涼州行	古題樂府	貞元七年(791)或稍後	詩云：「邊頭州縣盡胡兵，將軍別築防秋城。」背景當與張籍〈西州〉、〈塞上曲〉同。時二人在河北「鵲山漳水」一帶共同求學。	
促刺詞	新題樂府	貞元八年(792)以前	根據張籍同唱現象，王作疑受到張詩啟發，推測作於兩人共同求學期間。	促促詞
行宮詞	新題樂府	貞元十二年(796)	詩云：「休封中岳六十年。」玄宗開元二十二年(734)幸東都，二十四年回京，此後再無幸東都事。由開元二十四年下推六十年為貞元十二年，故繫之。	
關山月	古題樂府	貞元年間(785-805)	詩云：「金沙嶺西看看沒。」據《新唐書·地理志四》，金沙嶺在西州交河郡。知為安史亂後，吐蕃陷隴右事，背景當與張籍〈西州〉同。又此題有張籍同題同唱，故繫於兩人共同求學時期，時為貞元年間。	關山月
送衣曲	新題樂府	貞元年間(785-805)	根據「隴坂」語，與張籍同唱現象，推測當指吐蕃入侵事，時在貞元年間。	寄衣曲
射虎行	新題樂府	貞元年間(785-805)	詩云：「惜留猛虎著深山，射殺恐畏終身閑。」據《新唐書·張伯儀傳》：「〔伯儀〕卒，贈揚州大都督。既請謚，博士李吉甫議以『中興三十年而兵未戢者，將帥養寇藩身也。若以亡敗為戒，則總干戈者必圖萬全，而不決戰。若伯儀雖敗，而其忠可錄』。遂謚曰恭。」案：李吉甫於貞元初年拜太常博士，合「中興三十年」之說，詩意似指當時「帥養寇藩身」的現象。又其時張籍、王建同於「鵲山漳水」一帶求學，時以樂府唱和，故繫之。	猛虎行
隴頭水	古題樂府	貞元年間(785-805)	據詩意，當以吐蕃入侵隴右為背景，故繫之。	

王建樂府	新／古樂府	繫年	根據	張籍同唱
古從軍	古題樂府	貞元年間 (785-805)	根據「西涼州」語，當以吐蕃入侵為創作背景。案《舊唐書·地理志三》：「後魏置張掖軍，孝文改為郡及縣，州置西涼州，尋改為甘州。」又《新唐書·禮樂志》：「安祿山反，涼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吐蕃在安史亂後不斷寇邊，據詩意「回面不見家，風吹破衣服。金瘡在肢節，相與拔箭鏃」，足見戰爭之慘烈。而唐吐戰爭在貞元之後趨於緩和，故將這首詩繫於貞元年間，以唐領土大量失陷於吐蕃為背景。	
塞上梅	新題樂府	貞元年間 (785-805)	據「隴頭」、「隴水」語，當以吐蕃入侵隴右為背景，故繫之。	
遼東行	古題樂府	貞元年間 (785-805)	根據根據徐禮節、余恕誠先生考訂，這三首詩與張籍〈征婦怨〉、〈別離曲〉均寫及「遼水」、「遼陽」，疑為同唱，故繫於貞元四年。然尹占華先生以為王建詩可能任劉濟幕職時，隨軍出征，根據權德輿為劉濟寫的墓誌銘：「〔貞元〕十九年，林胡率諸部雜種浸淫於澶薊之北，公親率革車會九國、室韋之師以討焉。」故繫於貞元十九年。由於史料無足徵，暫繫於貞元年間。	
渡遼水	古題樂府	貞元年間 (785-805)		
遠征歸	新題樂府	貞元年間 (785-805)		
荊門行	新題樂府	貞元年間 (785-805)	王建〈荊南贈別李肇著作轉韻詩〉：「兩京二十年，投食公卿間。……上宰鎮荊州，敬重同歲遊。」李肇兩唐書無傳，但根據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載李肇元和十三年(818)自監察御史充翰林學士。依照唐人遷轉常例，李肇很可能早年先在兩京求薦無果，後歷荊南幕職，再入朝為監察御史。姑且不論李肇在荊南幕府的任期長短，亦即直接從元和十三年上推二十年，為貞元十四年。故可證王建在貞元年間曾至嶺南一帶，故繫之。	

王建樂府	新／古樂府	繫年	根據	張籍同唱
水夫謠	新題樂府	貞元年間 (785-805)	詩中描寫水夫勞動應以長江流域為背景，亦即王建在嶺南一帶時。	
水運行	新題樂府	貞元年間 (785-805)	據「西江」語，王建時在嶺南，故繫之。	
田家行	新題樂府	貞元年間 (785-805)	根據「野蠶」、「麥」、「黃犢」語，背景疑與〈荊南贈別李肇著作轉韻詩〉：「賣馬市耕牛，卻歸湘浦山。麥收蠶上簇，衣食應豐足」同。故繫於貞元年間，時王建至嶺南。	
簇蠶詞	新題樂府	貞元年間 (785-805)	詩及簇蠶的細節，疑王建在嶺南時所作，背景與〈田家行〉同，故繫之。	
東征行	新題樂府	元和十二年 (817)	《王荊公堂百家詩選》何焯批：「裴度征懷西事也。」根據《舊唐書·憲宗紀下》，事在元和十二年丙辰。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 王建著，尹占華校注，《王建詩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6。
- 元結著，聶文郁注解，《元結詩解》，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
- 元稹著，周相錄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 _____，《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 戎昱著，臧維熙注，《戎昱詩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 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
- *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79。
- 周珽輯，《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26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
- 孟榮，《本事詩》，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晁公武著，孫猛校正，《郡齋讀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 * 張籍著，徐禮節、余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 清高宗御選，《唐宋詩醇》，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
- 傅璇琮編撰，《唐人選唐詩新編》，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 彭定求等奉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79。
- 董誥等奉敕編，《欽定全唐文》，臺北：匯文書局，1961。
- 劉昫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鍾惺、譚元春輯，《唐詩歸》，《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9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韓愈著，劉真倫、岳珍校注，《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
- 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二、近人論著

- * 王運熙、王國安，《樂府詩集導讀》，成都：巴蜀書社，1999。
- 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庫》第47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清刊本。

- * 松浦友久著，孫昌武、鄭天剛譯，《中國詩歌原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0。
- 高步瀛選注，《唐宋詩舉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 陳寅恪、元稹撰，《元白詩箋證稿·元氏長慶詩集》，臺北：世界書局，2010。
- 華忱之，〈唐孟郊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0冊，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頁379-476。
- * 葛曉音，《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 * _____，《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廖美雲，《元白新樂府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 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2002。
- 鍾優民，《新樂府詩派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Yinke and Zhen Yuan. *Yuan Bai Shijian Zhenggao, Yuanshi Changqing Shiji (A Testifying on Yuan Zhen and Bai Juyi's Poems)*. Taipei: The World Book, 2010.
- Du, Fu. *Dushi Xianzhu (Collected Annotations of Du Fu's Poetry)*, annotated by Zhou'ao Qi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
- Ge, Xiaoyin. *Hantang Wenxue de Shanbia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betwee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 _____. *Shiguo Gaochao yu Shengtang Wenhua (The Climax of Poetry World and High Tang's Cultur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 Li, Bai. *Li Taibai Quan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 Bai)*, annotated by Qi W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7.
- Matsuura, Tomohisa. *Zhongguo Shige Yuanli (Principles of Chinese Poetry)*, trans. Changwu Sun and Tiangang Zheng.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1990.
- Wang, Jian. *Wang Jian Shiji Jiaozhu (An Annotation of Wang Jian's Collection of Poetry)*, annotated by Zhanhua Yin. Chengdu: Bashu Press, 2006.
- Wang, Yunxi and Guo'an Wang. *Yuefu Shiji Daodu (An Introduction to Yuefu Shiji)*. Chengdu: Bashu Press, 1999.
- Zhang, Ji. *Zhang Ji Ji Xinian Jiaozhu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and Annotations of Zhang Ji's Works)*, annotated by Lijie Xu and Shucheng Y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

Zhang-Wang *Yuefu*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Yuefu* Poetry

Lu, Chia-hu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chlu@hksyu.edu

ABSTRACT

Li Bai and Du Fu were the two poets responsible for writing the most *yuefu* poetry in the High Tang. However, whereas Li concentrated on old style *yuefu*, Du also wrote titles in the new style. In the Middle Tang,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yuefu*” poetry formally named by Yuan Zhen and Bai Juyi, Zhang Ji and Wang Jian composed *yuefu* poetry in both the new and old styles. On the one hand, Zhang and Wang accepted Du’s idea of combining current events, the *gexing* form and lyrical titles, which followed examples found in works from the Han and Six dynast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lso expanded upon those lyrical titles with content targeted at current events. While they followed Li Bai in composing *yuefu* in ancient verse instead of regulated form, they also deepened the *yuefu* tradition of “caring for the people’s suffering,” which differed from the concerns informing Li’s works. Both their old and new style *yuefu* took an interest in current events. Zhang and Wang’s *yuefu* broached new subjects and their style of writing appeared in the later works of Li Shen, Bai Juyi and Yuan Zhen. In other words, Zhang and Wang’s mutually inspired poetic innovations influenced the later literary production of Yuan Zhen and Bai Juyi.

Key words: Li Bai, Du Fu, Zhang Ji, Wang Jian, new *yuefu*

(收稿日期：2013. 6. 3；修正稿日期：2013. 10. 28；通過刊登日期：2013. 11. 27)